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信息导航

INFORMATION

2012年第1期 总第24期

经济研究导航	9
理论研究	9
《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	9
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与发展问题	9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9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观的比较	1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引证	10
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教学	1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问题与出路	11
中国经济研究	11
中国体制转型与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配差距——一个资产转换的视角	11
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12
偏向性技术变迁、习惯形成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基于 RBC 模型的实证分析	12
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 TV-ST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12
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研究——基于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视角	13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及其程度评估	13
是何因素制约着中国居民消费	14
中国粮食价格波动趋势及内在机理:基于双重价格的比较分析	14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4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重视强政府与旺市场的建设	15
区域经济	15
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15
产业集聚、本地市场效应与区域发展——以成都经济区为例	16
“三农”研究	16
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效应与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	16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	16
三重二元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对民工荒的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17
我国农业现代化测评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17
城市化进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对策	17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农业保险发展路径的现实选择	18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追溯及经验启示	18
工商管理	18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18
政治关联、并购绩效与高管变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19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	19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20
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的对策思考	20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问题研究	20
我国中小企业在低碳经济制约下的升级与转型	21
文学研究导航	21
古代文学	21
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	21
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	22
论“语体”及文体的前“文体”状态	22
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	22
唐代咏石诗的新变与转型	23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23
图像、仪轨与文学——略论中唐密教艺术与韩愈的险怪诗风	24
“眉山记忆”与苏轼词风的嬗变轨迹	24
效体 辨体 破体——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	24
明代歌诗考——兼论明代诗学的歌诗品质	25
以城市书写为视角的明代奇书解读	25
晚清词坛的自我经典化	26
近现代文学	26
“狂人”形象的文化源流与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气质	26
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26
五四精神的坚守与放逐——论丁玲的解放区戏剧	27
论 20 世纪中国新诗的政治维度	28
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即为“国民文学”——“国民文学”的形成与提倡	28
当文学遇到大众——1930 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管窥	29
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	29

当代文学	30
西川的诗：从“纯于一”到“杂于一”	30
电影大批判：发动与运作	30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考	30
另一个世界——三个银幕女性的塑造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信仰表达	31
“代际”的出场与其存在的“焦虑”——关于新世纪一种文学现象的考察	31
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意识形态	32
困惑与迷失：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的叙事误区	32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3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3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33
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34
论海明威的小说悲剧	34
欧洲文学思潮近代形态的过渡性	35
文艺学	35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	35
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	36
论中国古典诗学譬喻性的传统	36
论中国文论的三部曲——兼及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	37
崇简尚韵的意境营造——古代小品文对确立文学叙事的意义	37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38
游戏精神：再造童年和自我超越——论童年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	38
审美形式、文学虚构与人的存在	38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39
教育研究导航	39
高等教育	39
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模式——对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文化逻辑解 析	39
大学制度改革目标探析	40
对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因素的思考	40
“问题”抑或“主义”——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争论与反思	41

英国高等教育入学政策：扩招与公平	41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公共选择倾向——从撒切尔到布朗	41
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现象”之比较	42
为教育政策提供证据——当前英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42
基础教育	43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的特征及其文化阐释	43
新时期基础教育校际师资均衡：本体、必要与可行	43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4
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五种主体形态	44
普适与朴素：基础教育教学创新的品质	44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个假设	45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特征及其文化阐释	45
课程·教材·教法	46
我国知识教学面临的三大挑战与理论回应	46
中国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学为导向”综合型课堂教学模式	46
论教师的教材加工能力	47
将课程曲解为制度性文本：学校实验与八年研究	47
课堂评价的挑战	48
论有效教学的伦理性	48
论教学方法	49
西北农村地区新课程适应性的纵向研究——基于2003年与2011年调查的实证分析	49
十年教材建设：成就、问题及建议	49
论实践教学	50
心理发展科学	50
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培养模式	50
利用测试促进学习：记忆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与教育启示	51
自我增强取向下的亲社会行为：基于能动性和社交性的行为路径	51
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评估的理论模型建构与验证	51
竞争与情绪对顿悟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	52
内隐与外显记忆编码阶段脑机制的重叠与分离	52

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情感调节还是执行控制受损	53
什么是好的理论？基于理论心理学的视角	53
学科领域知识和学业成绩对工作记忆广度的影响	54
历史研究导航	54
古代史	54
《周礼》“六计”与战国时期的官吏考课制度	54
秦汉时期齐鲁贵族迁徙关中考述	55
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	55
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	56
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	56
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	57
明清县域地图与地方地理认知——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域地图的分析为中心	58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59
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59
近现代史	60
清末留日学生与地方督抚间的政治博弈——以留日陆军士官生为中心	60
从学潮走向政潮——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研究	60
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	61
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	61
社会文化史	62
论古典婚礼根植于人之情性	62
朝鲜使臣眼中的清朝产业与器物——同朝鲜朝的产业与器物相比较	62
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研究	63
五代时期的“中国”观	64
赋役关系与宋明时期广西左右江区域社会的演变	65
从循道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	65
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	66
世界史	66
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的言行为中心	66
何谓“东亚”？——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	67

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	68
吉野作造的日本在华权益观	69
体育研究导航	69
研究报告、新论坛	69
运动干预对小学生身心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	69
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分层现象的质性研究	70
新农村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形式实证研究	70
中国政府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法治推进	71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要素及作用路径研究	71
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目标科学性分析	72
老年体质的异质性及生命历程中累积的影响	72
发展职业体育：完善举国体制战略的抉择	73
“武中道场”的历史源起评述——兼论少林武术起源	73
区域体育发展差异与其战略选择——基于政府职能转型的视角	74
中西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比较——2011 体育新闻传播国际论坛述评	74
对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新思考	75
从《论语》看孔子的体育思想观念	75
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75
古希腊与中世纪体育的兴衰探源：基于对身体和娱乐的考察	76
城市不同家庭类型体育锻炼特征分析——基于“7 种家庭类型”的实证研究	76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	77
英国休闲体育政策的演进特点与启示	77
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的层次与评估指标研究	77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品牌定位研究	78
“以钱养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新思路	78
“城中村”居民体育休闲娱乐研究	79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	79
全国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现状统计分析	79
五禽戏锻炼对老年人抗氧化能力和肠道乳酸菌的影响及相关性研究	80
大学生身体活动阶段变化与健康状况关系的研究	80
榜样对大学生运动员自我损耗的补偿作用	81

运动竞赛与训练学	81
竞技体育视野下的女性性别认同建构	81
影响我国竞技体育潜优势项目发展的因素分析	82
美国棒球与板球发展消长之谜	82
世界女排强队比赛得分结构与球队成绩排名的相关性分析	82
构建跳绳大众锻炼等级评价标准的研究	83
体育教育、管理学	83
从“运动制胜”到“运动致趣”向俗回转的思考	83
建国以来我国高中体育教材内容的演变脉络与展望	83
我国体育课程实施研究评析	84
高校中年教师体育健身意识现状研究——以大连市高校为例	84
高校老师体育锻炼与工作倦怠研究	85
民族传统体育学	85
加与减：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另类思考	85
西汉初期健康导引术式名称中哲学问题的探讨	85
竞技武术“文化实间”之研究	86

经济研究导航

理论研究

《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

作者: 许光伟, 谌洁

来源: 《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5-15, 41

《资本论》作为总体逻辑,是对统一历史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为现象发生学与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明资本存在的“秘密”:1-3篇以价值具体地生长为资本主义价格的过程,说明经济利润的一态系统;4-6篇以“阶级斗争I”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现实展开机制,说明经济利润的多态系统;以“阶级斗争II”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说明经济利润的虚拟运动系统;终篇以阶级生活图像的定格化过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明资产阶级认识论的规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阶级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论范畴,旨在根除“伪科学”对经济理论建构的影响,终结“庸俗”,使科学还原为推动历史生长的革命性力量。

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与发展问题

作者: 卫兴华

来源: 《经济纵横》2012年第1期 1-7

对于劳动价值论问题,我既不赞同错解、曲解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也不赞同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固守只有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观点,而是主张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如商业劳动和某些精神生产劳动可以创造价值。我认为,不应该区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商品经济概念,所以创造价值的劳动应该体现商品经济关系,劳动的重要性不能用是否创造价值来衡量。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作者: 徐则荣, 丁冰

来源: 《经济纵横》2012年第1期 21-25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既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各自出于不同的经济地位而有着自己不同的经济利益要求和经济观点,这就决定了近现代社会必然会产生和存在着反映两大阶级利益的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本文通过对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使人们更清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才是最科学、最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观的比较

作者: 钞小静

来源:《经济纵横》2012年第2期 14-17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问题进行过研究,但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都是不同的。发展的内在机制是马克思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从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视角研究发展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依据发展的内在机制,通过理论抽象来研究发展问题;西方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从应用范式角度展开的。通过比较可知,我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同时借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思想,建立科学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引证

作者: 罗郁聪, 杨继国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1-7, 9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只限于《资本论》,应该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到《资本论》,再到《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为其著作写的序言及其书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能忽视的内容,许多深刻含义、写作意图、研究方法都是通过这些“序言”和“书评”揭示出来的。马克思完成的著作基本只是“狭义政治经济学”,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系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广义政治经济学”。

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教学

作者: 许光伟, 谌洁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8-12

方法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背景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教学”,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途径,是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需要,也是经济学专业系统学习的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教学,要求教材中要体现方法论,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备“方法”、讲“方法”、用“方法”、考“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问题与出路

作者:常荆莎,欧阳功林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13-1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理论引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大众全面深刻认知、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积极参与改革创新与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某些方面还不能全面回应、解释、解决大众实践中的问题,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恰恰是理论发展的机遇。

中国经济研究

中国体制转型与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配差距——一个资产转换的视角

作者:何晓斌,夏凡

来源:《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28-40, 119

文章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1988、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的趋势。

势。

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作者：陈晓莉，孙晓红

来源：《经济科学》2012年第1期 12-26

文章主要研究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特别是对中国物价和产出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含有块外生性的结构 VAR 模型，对比检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前后的不同影响。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和物价均存在正向影响，其中对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美国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后，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对中国产出和物价波动的贡献率显著上升。总体而言，通过金融市场渠道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强于国际贸易渠道。

偏向性技术变迁、习惯形成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基于 RBC 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者：吕朝凤，黄梅波

来源：《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31-43

文章构建了一个同时引入偏向性技术变迁与中性技术冲击的包含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对 1979-2009 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模型的预测结果与中国的特征事实较一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解释力要强于未包含劳动的 RBC 模型、包含资本劳动的可分劳动 RBC 模型、引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的可分劳动 RBC 模型,说明这一模型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与正的中性技术冲击具有正财富效应相反,正的偏向性技术变迁冲击具有明显的负财富效应特征;我国 1979-2007 年间推行的降低劳动弹性的偏向性技术变迁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增加、资本积累与 GDP 产出的提高,故而认为,这个战略是成功的。

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 TV-ST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者：吴吉林

来源：《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44-53

文章使用 TV-STAR 模型研究发现,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共存。结构性变化发生在 1995 年左右,结构性变化前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高、低两个均衡点,结构性变化后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唯一均衡点,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较变化前有较大幅度上升。同时发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非线性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其临界值为 4.091。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发现,结构性变化后,我国通货膨胀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幅度下降,但反应速度上升。另外,正、负向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在短期内,通货膨胀机制下的冲击影响要明显强于在通货紧缩机制下,但从长期来看,通货紧缩机制下的冲击影响更持久。在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也更明显。

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研究——基于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视角

作者:李文洁

来源:《经济学家》2012年第1期 21-29

文章利用 1991—2007 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时间趋势和地区差异,并以此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不同区域对策,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研究发现,能源开发强度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为负,说明能源开发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从影响的时间趋势来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影响逐渐从正向转变为负向。从影响的地区分布来看,能源开发在样本时间内对西部和中部经济的影响为负,而对东部经济的影响为正。对于这种差异性,本文认为,宏观政策的倾斜导致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差异,并且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不同也是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实行适宜本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及其程度评估

作者:李永友

来源:《经济学家》2012年第1期 64-73

需求结构变化虽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一般变化模式,但从需求结构变化中的收入效应、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依据这些规律,我们构

造了居民消费率变化与三类效应之间的关系等式。根据这一等式模拟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情况进行的评估表明,尽管我国需求结构存在失衡,但失衡程度相对有限,如果剔除水平因素,失衡总体上还是在经济增长可以承受范围之内,其中,居民消费率只是近年来才表现出偏离一般水平的变化模式。

是何因素制约着中国居民消费

作者:沈坤荣,刘东皇

来源:《经济学家》2012年第1期 5-14

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给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挑战,扩大居民消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是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的客观要求。文章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分别从不确定性、收入分配和公共支出三个视角系统地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研究分析表明,居民谨慎的消费行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公共支出转型滞后等都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粮食价格波动趋势及内在机理:基于双重价格的比较分析

作者:龚芳,高帆

来源:《经济学家》2012年第2期 51-60

本文试图借助对粮食政府价和市场价的比较分析,基于“价格-主体-行为”的框架对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机理进行新的诠释。我国粮食政府价与市场价分别呈现出6—8年和2—3年的波动周期。在影响机理上,前者受国内物价水平和国际粮价影响显著,其贡献度分别约为75%、25%;后者受供需、货币以及国内外价格水平影响显著,其贡献度约为50%、40%和10%。市场主体的参与程度以及行为特征是导致此种价格机理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粮食价格形成过程表现为政府与多种微观经济主体交互作用的产物,而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在特定阶段的约束条件下,政府借助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来实现其粮食增产、粮价稳定和农民增收等组合型目标。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作者:唐龙

来源:《经济纵横》2012年第1期 46-49,54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十一五”时期经济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政府和企业占有剩余过大与居民劳动报酬率偏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两大主要问题。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消费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作用,需要遵循“共建、共享、共富”的指导思想,建立系列约束目标。同时,抓住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针对经济增长中的调节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两大突出问题,从诸多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重视强政府与旺市场的建设

作者:杨承训

来源:《经济纵横》2012年第2期 7-13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作用谁轻谁重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无为而治”,而是交换关系中的趋利竞争。因此,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应该重视建设“强政府、旺市场”,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并注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区域经济

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生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作者:潘文卿

来源:《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4-16, 30

文章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研究了1988-2009年间中国各省区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结果显示:一方面,存在着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大;另一方面,局域相关也显示出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特征越来越明显。以一个表征市场潜能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本文通过计量分析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经验分析表明,空间溢出效应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市场潜能每增长1%,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将提高0.47%,超过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弹性值。当然,实证分析也发现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距离间隔的增加而减少。

产业集聚、本地市场效应与区域发展——以成都经济区为例

作者：陈健生，李文宇

来源：《经济学家》2012年第2期 38-44

本地市场效应指的是,如果本地市场规模较大,产业会受到市场引力的影响,更倾向定位于本地,从而形成产业集聚。本文以成都经济区为例,通过区位基尼系数度量了产业集聚状况,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区内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和影响规模,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成都经济区明显存在,并且对产业分布起到关键作用。可以认为,现阶段成都经济区内集聚力大于扩散力,成都正处于集聚发展的关键期,要顺应这一趋势,引导产业在区内合理分布,促进成都经济区发展。

“三农”研究

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效应与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

作者：魏下海等

来源：《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62-72

本文尝试在统一的框架下分解出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分布对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的效应。利用 CHNS 数据得到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引致的价格效应是工资残差不平等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同时发现,1991-2009 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贫穷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而 2000-2009 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富有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1991-2009 年间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残差不平等加剧,而城镇化和外资有缩小残差不平等的作用。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

作者：悦中山等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2年第1期 1-11,124

论文建构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其中社会经济融合是方向无涉的,而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双向性。概念将市民纳入研究视野,为农民工融

合状态的评估提供了标尺,有助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的准确理解。论文的重要发现包括:农民工文化融合的首选策略是融合策略,心理融合以融合型和融入型为主,制度障碍是导致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重要因素。

三重二元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对民工荒的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作者:夏永祥,魏玮

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12年第1期 12-17,124

传统的人口流动模型建立在单一的城乡二元经济基础之上,不完全适合解释中国的人口流动问题,尤其不能解释民工荒现象。本文依据中国特殊的城乡和区域双重二元经济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人口流动的特殊性,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建立了新的人口流动模型,并以此分析我国产生民工荒现象的原因,提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现代化测评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作者:王国敏,周庆元

来源:《经济纵横》2012年第2期 69-74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及其采取的实现模式,必须以其所处阶段和发展水平的正确判断为逻辑起点。本文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定法构建农业现代化测评体系,并以此对我国内地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上已进入农业现代化初步实现阶段,同时,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非均衡性、整体偏低性、梯度演变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实现模式不能“一刀切”,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区情”和“农情”,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

城市化进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对策

作者:柯楠

来源:《经济纵横》2012年第1期 75-77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社会权问题凸显。现阶段,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消除在失地农民社会权保障制度建设上的认识误区;二是完善非农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建立有偿使用制度,增加失地农民财产性收入;三是完善法律援助机制,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益;四是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健全失地农民社会权保障法制体系。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农业保险发展路径的现实选择

作者：樊增强，张迎涛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57-61

农业保险的健康高效发展能有效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要完善农业保险范围和发展路径，提高农业保险效率，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和服务等创新。以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为依托，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纽带，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建立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农业保险组织模式；通过开发区域产品和加强技术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保险公司外部环境、内生动力有效结合和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通过政府服务创新，建立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追溯及经验启示

作者：张献，郭庆海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62-67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从古至今其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自然环境等农地制度改革进程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运用和实践。农村土地流转所表现出来的土地产权、土地价格以及配套政策安排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其所反映出来的土地兼并两极化、完全私有的社会分层矛盾、非经济强制手段弊端等问题更应引起我们重视。

工商管理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作者：刘星，徐光伟

来源：《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86-102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

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政治关联、并购绩效与高管变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作者:吴超鹏等

来源:《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90-99

本文考察了CEO的政治关联是否影响其并购败绩后被变更概率,以及政治关联CEO被变更时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显示:(1)CEO并购绩效越差越容易被变更,但是政治关联CEO即使并购绩效差也不易被变更,这一现象在政府干预较少的省份较不明显;(2)政治关联CEO被变更时的市场反应好于其他CEO,而且其所实施的并购绩效越差,其公司所在地政府干预越严重,其被变更时市场反应越好。本研究率先揭示了政治关联CEO通过并购影响公司价值的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从而为监管层规范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地方政府转变干预经济的方式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

作者:曹廷求,田金秀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94-101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机制作为外部机制减少高管代理问题的作用,研究认为,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在竞争性强的企业发挥作用较小。然后,从股东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在要求出发,证明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考虑到国有企业可能存在产权不明、所有者缺位等特殊问题,使用了总样本和非国有上市企业样本分别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公司治理的完善应该在建设好企业破产机制的基础上,更多的在外部竞争环境较弱的公司中展开。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作者：徐光伟等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2012年第2期 76-84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例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2)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多数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终极控制特征并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并且分离度越大，公司持有的现金比例越低；(4)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将降低股票横截面收益，说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降低了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多元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待未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结果为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代理理论提供了证据。

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的对策思考

作者：李玉英，黄桂杰

来源：《经济纵横》2012年第1期 108-110,117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的一项核心财务政策，股利的发放与否以及如何发放关系到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作为公司股利决策者的控股股东制定何种股利政策就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实践情况来看，控股股东既可能制定符合全体投资者利益的股利政策，也可能只制定有利于自己而有损于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股利政策，本文将要探讨的是后者。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问题研究

作者：杨维芝

来源：《经济纵横》2012年第2期 89-92

如何使给付的薪酬具有最大的激励效果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富有激励性的薪酬策略不但能帮助企业和留住优秀的高管人员，还能影响高管的责任感和他们为企业付出努力的程度。由于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脱胎于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和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关注。

我国中小企业在低碳经济制约下的升级与转型

作者：徐世刚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82-85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在低碳经济制约下升级与转型的挑战与压力。在中小企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企业依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升级与转型的路径选择；需要企业社会责任观的转型；需要政府采取比较完善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等。

文学研究导航

古代文学

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者：徐公持

来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4-16

所谓“制式文章”，是指主要被制度所决定的、体现制度精神的格式化文章。这种格式化，包括文章内容上的特定要求和体式上的专门规制。中国古代制式文章萌生于上古，周代续有发展。秦始皇统一海内之后，随着皇权体制的建立，在李斯等人的策划下，开始了朝政文章制式化的全新进程。汉承秦制，制式文章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制式文章也成为礼乐精神和“礼文之事”的直接载体。汉武帝以后直到东汉末，是制式文章得以全面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第一位对制式文章作出理论总结的是蔡邕。制式文章本质上是皇权话语权力的外化形式，它随着皇权体制的绵延而生长了两千余年，成为中国古代文章和文学领域一种主流形态和特色景观，直到清末民初，帝制消亡，朝政制式文章才随之结束其历史使命。制式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学形成多方面的巨大影响；文章制式的存在，也对文学的自由创造本性构成限制。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制式文章中也产生过一些突破制式限制和束缚的文学精品，呈现出“创作就是克服困难”的魅力。

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

作者：易闻晓

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49-54

从写作的实情看，汉人为赋为颂，必有前代与当世文体的交越互用，而赋颂不分，要在赋体颂用，赋是主导的方面，赋的铺陈总是以显示与炫耀表现为颂的功用。从观念的角度看，汉人本于经学立场援《诗》说赋，将《楚辞》纳入《诗》的流变系统，并以荀赋为关捩，而将《诗》学讽劝观念加予赋篇之上，由此形成“讽颂同构”与“二律背反”。从时代的好尚看，帝王的润色鸿业与词臣的出处志节相与为伴，主导着汉大赋的颂扬倾向，而又表现为大国的意绪、物类的铺陈与才学的展示。

论“语体”及文体的前“文体”状态

作者：胡大雷

来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17-24

文体在定型前的前“文体”状态，或是“语体”状态，或有着“意有所随”的种种伴随物或共生物，对文体形成时这类原生态状况的研究，有着这样几条途径及几方面的意义：探讨文学产生的原生态状况，如诗歌的口头的、集体的创作是怎么一回事；探讨伴随文学的语境、情景、场景，如“难”体发生时的种种伴随或共生；探讨“语体”及前“文体”状态如何向“文体”转换、演进的，如众人的讨论为什么会变成专题论文；探讨诸文体相参状态下会脱略什么、会增添什么，及如何向单纯文体演进；探讨“语体”及前“文体”状态的特征，是为了更深入把握文体进化的过程与规律。

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

作者：王琳

来源：《文史哲》2012年第1期 94-110

地记著述在六朝达到空前兴盛状态，作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而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南朝时期私家藏书甚富的陆澄、任昉、顾野王等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文化发展的新动向，编撰有集成性的地记丛书或地理总志。与史书地理志相比，六朝地记作者崇尚实用的观念较为淡薄，他们在写作中往往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和轶事传闻的记述，讲究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喜欢猎奇，乃至采纳为正统史家所不屑的虚诞不经的故事。大体言之，六朝地记具有

地理与文学渗透融合的性质。六朝地记融会地理与文学的特色对古代地志、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咏石诗的新变与转型

作者：朱易安，王书艳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96-102

咏石诗是咏物诗的一部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就唐代而言，唐人构筑私家园林的渴望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使咏石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变，更注重山石的形态描摹和象征山林的抽象审美；反过来，赏石和诗咏也对园林建构和赏石文化产生影响，不仅形成了堆山叠石以营造山林之境的审美传统，而且对园林营建重视写意手法和虚实真假的造园理念也有深远影响。园林赏石和咏石诗歌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过程。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作者：张明华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86-96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赋得诗及其在唐代形成的三种形态，在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直到今天，分题诗、分韵诗这样重要的问题还完全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试帖诗研究虽已有几部专著，也还远远不够。因此，可以说，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赋得诗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图像、仪轨与文学——略论中唐密教艺术与韩愈的险怪诗风

作者：黄阳兴

来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49-60

佛教密宗崛起于盛中唐时代，对中晚唐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带来佛教艺术的变革，而且推动了中唐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韩愈诗歌的险怪诗风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自近代学者沈曾植提出以西藏密宗曼荼罗及中唐密教图画观照韩愈诗歌以来，学者多承袭此说，然尚有未完善处。笔者尝试发挥前人未尽之说，就韩愈险怪诗风与密教传法艺术之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着重讨论学者关注较多的《陆浑山火》、《南山诗》以及《游青龙寺》等诗歌作品，支持韩愈诗歌受密教艺术影响说，并进一步指出中唐韩孟诗派追求险怪的诗风可能受此佛教艺术变革潮流的影响。

“眉山记忆”与苏轼词风的嬗变轨迹

作者：马里扬

来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69-80

本文就苏轼歌词创作与故人杨绘相关的种种文学“小环境”事件详为考证，抽绎出“眉山记忆”作为苏轼词风形成与演变的内在动因。苏轼与杨绘交往之始，当于杨绘知眉州而苏轼归乡丁忧的治平年间。眉山交往与苏轼的故国之思相互缠绕，融会为特有的情感关联即“眉山记忆”；使得熙宁倅杭时处在“被迫创作”情势之下的苏轼歌词，能够突破艳情字面的束缚，形成自是一家的词风。元丰三年贬谪后的苏轼歌词创作，更于“眉山记忆”中注入了深重的“天涯沦落”之感，词风也由雄壮疏放趋向清冷孤寂。还原词人交往所构筑起的文学生态圈，呈现的是苏轼独特词风的嬗变轨迹。

效体 辨体 破体——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

作者：赵维江

来源：《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 57-64

从千年词史的发展看，词体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创作环境和词体观念的变化，词体形态一直在不断地演化着，这个过程至少到金、元时代还未停止。元好问词体革新的实践和成就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他通过“效体”及其他方式，从前代各种不同的词体形式中汲取营养，使其词具备一种“集大成”式的“兼美”品格。元好问以明确的“辨体”意识

和实践为苏、辛体“正名”，其雄浑沉厚的词风秉承苏、辛而别具风貌。他沿着辛弃疾“以文为词”的道路继续开拓，“破体”为词——引入传奇内容和笔法，为已开始边缘化的词体注入新的活力。

明代歌诗考——兼论明代诗学的歌诗品质

作者：孙之梅

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97-105

明代诗学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是格调说和性灵说，由于对曲以外的歌诗缺乏认识，关于二者的研究，前者侧重于范畴的界定与渊源的考辩，后者则突出其时代精神与思想史意义的阐释，皆程度不同地无视明代诗学赖以产生的独特生态以及诗学本身的具体指向。明代有无文人歌诗？清代以来，学术界就认为歌诗之法至明已亡，完全变成了文章之事。但是我们发现明代除了民歌外，尚有文人歌诗。文人歌诗乐律与诗歌声韵的二而合一的理念，直接导致以声论诗，而以声论诗又是格调论中“调”的直接来源。民歌“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靡”的声乐特点，以及这种声乐所反映的自然之趣、真趣，既与格调说以声论诗相契合，又构成了性灵说的核心价值。

以城市书写为视角的明代奇书解读

作者：葛永海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19-128，161

就文本形态而言，明代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有贯穿始终的城市书写，但在内容与笔法上，则有浓淡深浅之别。当中国古代城市职能经历“城—都—市”，即由军事中心到政治中心再到经济中心的演进时，明代“三大奇书”恰与这种城市职能的演替对应和暗合，如果说《三国演义》突出“城”，那么《水浒传》关注“都”，而《金瓶梅》则是典型的“市”小说。由此，三大奇书建构了古代文学值得注意的三种人城关系模式：城与城的对抗、人与城的对抗以及城对人的操控。因为涵括了古往今来人城关系最尖锐、最典型的三种情形：以城池为目标的政治争夺、市民对都市强权的反叛、个体在城市中被“物化”，所以，描写人与城市的冲突及其后果应是明代奇书的主题内涵之一。

晚清词坛的自我经典化

作者：张宏生

来源：《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 65-74

文学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在不断的阅读阐释中体现出新鲜生命力的作品。经典的形成与后世读者的体认密切相关，也与当代读者、批评家的体认密切相关。词的自我经典化在宋代已经出现，至晚清而进入一个突出的发展阶段，这主要在词话和选本中体现出来，前者以况周颐和陈廷焯为代表，后者以谭献为代表。其动机，一方面要以此展现常州词派的创作实绩，另一方面则希望为后学指引门径，因此将自己的作品树为坐标，常有具体的分析和对比。他们的努力，得到同时代词学家的认可，所以他们所标举的，就不仅是自己的经典，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代公认的经典，而这些又与晚清词坛高度的创作自信密切相关。

近现代文学

“狂人”形象的文化源流与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气质

作者：耿传明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48-154

五四新文学是以鲁迅《狂人日记》这样的非常态人物和非常态叙事为开端的。这种现代“狂人”的出现，成为新文学呈现其自身文学文化特性的突出标志。《狂人日记》的重要性，在于它于文化鼎革之际通过传统自然人性论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结缘，重新激活了疯癫与文明这一古老命题。五四“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立足于自然人性论的这种道德浪漫主义态度的复兴。人情化的受社会群体主观视野和伦理规范制约的淑世型文化；由客观性的追求产生的一种追求至善，由客观真理主导的勘世性文化，两者实则是一种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清末民初文学异于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突出的差异，就是这种由淑世型到勘世型的文化气质的转变，它以唯我论和唯理论的文学形态出现，将为协同性文化所压抑的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追求解放出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别开生面的价值和意义。

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作者：罗庆云，戴红贤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00-105

该文拟探析周作人在1920年代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探索小学“国语”教学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系。20世纪20年代,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等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小学语文教科书由“综合知识”编写模式转向“儿童文学”编写模式。小学语文教育中“国语”教学的推广和儿童文学的兴起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思潮在教育界和文学界引发的新事物。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促使小学语文教育日趋“儿童文学化”。在此过程中,周作人独树一帜的儿童文学研究及其教育思想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国语运动变革了传统小学语文的文言文教育的语体形式,白话文运动为小学语文提供了语体文儿童文学的教学内容,新文化运动确立了小学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周作人等人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树立起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大旗,为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发展搭建了宽阔的平台,将儿童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关联起来,揭示出“五四”新“人学”思想在儿童教育上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成为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先锋。

五四精神的坚守与放逐——论丁玲的解放区戏剧

作者:贾冀川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55-160

解放区的生活在现代著名作家丁玲的生命中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散文、戏剧丰富了其艺术创作历程。丁玲的戏剧作品尽管不多,但它们与丁玲的小说和散文一样,浸透并见证了丁玲精神和情感炼狱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对五四精神的执著坚守和无奈放逐,从而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抗战爆发不久,丁玲就在1937年8月创作了展现热血青年直面抗战的残酷的独幕剧重逢,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也是解放区出现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一年后,丁玲创作了三幕话剧《河内一郎》,把视角投射到敌方,描述了日本兵河内一郎由被蒙蔽到觉醒的历程。这部作品流传到国统区后,茅盾称它是“坚强我们信心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受到严厉批评的丁玲积极配合秧歌剧运动,创作有秧歌剧《万队长》,可惜的是由于脚本遗失,未能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丁玲与她的战友逯斐、陈明合作,于1946年3月在张家口不顾长途行军的疲惫匆匆完成了三幕话剧《窑工》,讲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底层劳工的命运。从承认《重逢》完全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戏,到“出于一种责任感”,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巩固胜利、巩固新区”来创作《窑工》,丁玲在度过炼狱般的经历后,五四精神在她的戏剧创作中最终被放逐。她从一个作为启蒙者的知识

分子，先是变成了一个需要被启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而成为了一名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战士。当然，她的戏剧艺术的水平也在不断下滑。近四十年后，丁玲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思想要解放，要独立思考”的主张，但直到她1986年病逝，她都生活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巨大阴影中。

论 20 世纪中国新诗的政治维度

作者：张桃洲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23-130

由于特定的历史情势，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和难以“割舍”的纠缠关系。在不同时期，这种关系显现出并不相同的面貌、特征和取向。本文着眼于20世纪新诗进程，并没有全面论述新诗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只是从二者发生关联的“缝隙”处，探讨政治之作用于新诗创作及发展的“另类”风景，新诗对于政治影响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革命诗歌的幽婉情调、现代主义的政治内蕴、政治抒情诗的“异质性”、“叛逆”诗学的政治特点、底层写作的政治性限度与可能等。

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即为“国民文学”——“国民文学”的形成与提倡

作者：王向远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90-98

“国民文学”是在各个“民族文学”发展、融合、凝聚的基础上，在“国家”这一现代性民族共同体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形态。“国民文学”只能包括、凝聚，而不能替代和覆盖“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发展必然指向“国民文学”。当今世界各国，民族身份的现代化就是“国民化”，传统“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就是“国民文学”。“民族文学”已经或正在被“国民文学”所吸收、所融汇，文学的“民族”分野日益模糊化，而文学的“国民”分野则日益明朗化。从“民族文学”发展到“国民文学”，再发展到“区域文学”，最后发展到“世界文学”，是人类文学史横向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应顺应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大势，强化“国民”及“国民文学”的观念与意识，促使“民族文学”向“国民文学”的进一步转化与凝聚。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在宣传“民族”观念、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强调“国民”与“国民文化”，在宣扬“民族文学”的同时而不强调“国民文学”，就无助于促进民族观念向国民观念的转变，无助于促进民族文学向国民文学的转变，无助于国家整

体“软实力”的壮大，因此，必要通过大众媒体、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多种方式，不断地强调传统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国民文化”，传统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就是“国民文学”，从而促进国内各民族成员的国民意识的自觉，进一步促使“民族文学”向着“国民文学”转换与凝聚。围绕着“国民文学”所进行的学术理论研究，应该对世界各国的国民文学进行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在此基础上阐明“国民文学”形成的必然性，“国民文学”提倡的必要性，廓清“国民文学”概念与“氏族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论述国民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的个性、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的关系，区分文学的“民族性”与“国民性”的不同，指出“民族文学”融汇于“国民文学”的必然性。而只有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的“国民文学”，中国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学中独具一格，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当文学遇到大众——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管窥

作者：齐晓红

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29-139

“普及”与“提高”是贯穿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问题，但是普及与提高的对象及主体是需要重新界定的，也就是说，首先要追问的是文艺和大众到底是什么？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是内在于这两个问题之中并以之为前提的。在30年代的讨论中，文学并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标准的存在，对文学是什么的认识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大众也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所指的群体，它在政党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叙述中都有具体的历史含义，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广大的文艺运动”的概念，则既是政党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自身的发明。

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

作者：徐仲佳

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57-164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因素中，性觉醒对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性爱思潮带来的性觉醒在1920年代撕开了数千年来男权意识形态的帷幕，使得女性作家具有了“为人”与“为女”的双重自觉，发出了女性言说的声音。另一方面，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男权集体无意识以及女性作家双重自觉的重合作为性觉醒的历史限度也在塑造、限制着初期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它不仅使得女性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产生身份焦虑，也使得她们不得不采取双重文本的书写方式。

当代文学

西川的诗：从“纯于一”到“杂于一”

作者：陈超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13-122

西川前期创作在保持庄重的精神向度的同时，捍卫了“元诗”的艺术自律性。90年代至今，西川逸出了“常体诗”，创造出一种自觉变构的“杂体”形式。杂体不再遵循预设的诗型，而是笔随心走，随物赋形，看似无体，实则体匿性存，更有难度地表达诗人宽大的本体意识，即形式是达到了目的的内容，内容是完成了的形式。他使诗的文体松动，包容力更广阔；使理性的整体话语和反理性同时“短路”，在个人化的“偏见”和奇想中依然保持了知识人格深刻的“思”的品质和写作的严肃性。西川所走过的创作道路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如果说他前期创作是“纯于一”的话，其后期创作则是“杂于一”。前面的“一”，是纯诗风格意义上的共性的“一”，后面的“一”则是诗人个体生命和灵魂话语的“（这）一（个）”。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经验告诉笔者，这个“一”的变化并不应导致我们得出“今是昨非”的结论。第二步如果是扎实可信的，必是在第一步之后走出，诗人是穿过了诗本体而非绕过了它。

电影大批判：发动与运作

作者：启之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6-52+152

电影大批判是大批判中最重要的领域，它由上下两种力量推动，上边是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及各单位的写作组，下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造反组织。写作组最早出现在上海，“文革”中推广至全国。写作组与媒体密切配合，由领导确定选题规划、重点稿件由写作组负责，配合性稿件由媒体安排。群众造反组织搞大批判花样繁多，主要的批判方式是出版报刊和编印图书。与群众造反组织的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式的批判不同，写作组重视资料和文本，用激进派的观点剪裁事实，重新解释历史是其特征。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考

作者：李亦中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4-21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历经四个不同阶段,总体上“走出去”的步伐显得迟缓,既受制于各个时期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折射出迥然有别的驱动因素及文化心态。在解放前,中国电影输出海外仅有零散个案;解放后17年,国产电影具有计划经济时代“内向型”特征;在新时期,中国影片频频亮相国际影坛,却陷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处境。抚今追昔,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担当,已经降临在当代电影人跟前,我们不是应该而是必须有所作为。

另一个世界——三个银幕女性的塑造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信仰表达

作者:裴亚莉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06-115

新中国银幕上的经典女性形象有很多,但是如果引入“社会主义的信仰表达”问题,那么我们会看到,当电影艺术家在涉及“非现世的世界”的时候,怎样处理这个可被表述为“封建迷信的世界”,不同的艺术家将会选择不同的态度;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也会选择不同的态度。本文选取《白毛女》《祝福》和《李双双》三个创作于新中国17年时期的影片,借助这些影片对喜儿、祥林嫂和李双双三个女性形象的塑造,试图证实以下判断:存在于不同艺术家个体和时代之间的关于信仰表达问题的差异,经过历史的流变,到1958年以后,那种被称之为封建迷信的“信仰”,将会被另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说是共产主义信仰完全代替。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乌托邦,也是关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经验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双重显现。

“代际”的出场与其存在的“焦虑”——关于新世纪一种文学现象的考察

作者:张立群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35-141

“代际”划分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热点现象。它的出场既反映了9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某种延续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某种原则、标准的确立。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代际”现象还隐含着影响焦虑下创作上的新趋势以及文学上的消费等若干问题。

而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上述问题加以阐释，必将会获得深远的意义。

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意识形态

作者：陈一军

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0-54

农民工小说具有突出的真实品格，这种非常艺术化的效果似乎将它与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然而，农民工小说叙事并未脱离意识形态，它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比如，实践路线、“以人为本”、经济主义等。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作用于叙事文本的形式较为隐蔽，且给小说叙事的艺术性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所以在小说作品中变得隐而不彰了。当然，不应忽视的是，农民工小说叙事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反叛天性，常常使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农民工小说叙事至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真实品格。它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个特殊人群——农民工的独特生活给予陌生化的文学呈现，使我们惊诧于这些背负着城乡二元体制、在“他者”的物质的城市里屈辱寒作的艰难痛苦的人生。这无疑是非常艺术化的效果，似乎在显示着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农民工小说叙事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打工生活的真切体验和表现，本身就是实践路线、“以人为本”、经济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作为新时期以后的文学样式，农民工小说叙事并未脱离意识形态，只不过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不再是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改革时代新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些新的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学的形式比较隐蔽，且给文学的艺术性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所以它便在农民工小说叙事中隐匿了。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农民工小说作为艺术具有“反叛，的天性，不会亦步亦趋于意识形态，常常又对它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困惑与迷失：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的叙事误区

作者：龙其林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1期 130-134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以来，便以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深厚的忧患情怀和敏锐的时代触觉感应着时代的脉搏，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蜕变。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官场小说，是以刘震云的《官场》、《官人》、《单位》等作品为肇始，之后在张平、陆天明、周梅森、李佩甫、王跃文、阎真、肖仁福、王晓方、魏剑美、唐达天、洪放等人的努力下，逐渐发展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毋庸讳言，当代官场小说创作势头虽然强

劲，但在作品叙事上已陷入到困惑与迷失的境地：官场小说热衷表现官场人物的情爱世界，叙事越来越耽于故事、情节的一隅，忽略了作品叙事中的逻辑关联。就当代官场小说而言，作家们对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官场生态进行了剖析，传达了个体所经历的价值冲击与思想迷惘的苦楚，从而将权欲竞相奔逐时代里人们信仰放逐、道德虚无、人格矮化的时代症候表现了出来。但是，当代官场小说的创作还缺乏面向灵魂的勇气，在表现时代本质、揭示生活真相以及写作的逻辑性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作家应该是精神世界里永无止境的思考者和探索者，他们应该怀着对终极理想的信仰、对真善美的追求、对黑暗的憎恶，用写作来体察人类的精神命运和历史处境，以揭示人类的困境与救赎的路径。只有如此，作家们才能真正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历史的暗角和现实的本质，当代官场小说的创作才能跳出叙事的误区。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作者：陈思和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67-74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建立的时候，它的精神基础究竟是什么？从来没有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容了那么多的语言、文化和学科背景。文章企图从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有关论述出发，重新梳理“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命题。这个命题来自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勒内·艾田伯。虽然从今天的立场来看，老一代人文主义学者的言论多少带有过于空洞的毛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返回到艾田伯的立场，结合现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新成果，重新来理解“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意义，让我们站在人类的某些共同性的立场上，恢复对文学表达人类生命感受的信心。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作者：杨慧林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4-48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建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比较文学”的根本命意及其应当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整体启发。这样，一方面是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趋于

萎缩,另一方面,勃洛克式的开放态度又引起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何以成为独立学科”的担忧,甚至造成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往往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拆解的部分。事实上,在汉语的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定位,已经意味着一切外国文学研究都必然以“比较”的观念为前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所以可能成为学科重构的典型,正在于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的论题范围和研究领域。而这一点,与当代学术的人文精神、消解学科的文化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作者:李冬木

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16-128

该文论旨在探讨鲁迅《狂人日记》“吃人”意像的生成,认为其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密切相关,是从这一言说当中获得的一个“母题”。为确证这一观点,本文主要着手两项工作,一项是对明治时代以来的“食人”言说展开全面调查和梳理,直至找到由摩尔斯到神田孝平这条线索,即本文“二”至“五”部分;另一项是在该言说整体当中找到鲁迅与前者“接点”,即“六”至“八”部分,具体论证了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狂人日记》“吃人”意像的决定性关联。结论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狂人日记》从主题到形式皆诞生于借鉴与模仿——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直到现今仍然绕不开的一条路。

论海明威的小说悲剧

作者:杨仁敬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78-85

海明威作为一个悲剧小说家,这一身份不论是从以往论者的评价中,还是从其自身的作品中,都可以得到确认。从荷马时代至今,悲剧形式不断有变化,悲剧因素成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海明威的小说悲剧大体可分为五类:身心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伤残或亲人死亡的悲剧,受到厄运打击的悲剧,大萧条背景下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悲剧,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悲剧,与大自然顽强拼搏失败的悲剧。海明威的小说悲剧写的都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通人遭遇的不幸,这与他的悲剧意识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其悲剧意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对大萧条现实的反思,对世界危机的思考,以及对战后重建时期的期待。海明威的悲剧意识将他的哲学思想、实践经验和审美艺术高度统一起来了。他崇尚写真实,倡导冰山原则,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刻画了栩栩如生的硬汉子形象。他从古典

悲剧里吸取了有益的东西,融入自己创新的元素,创作了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的现代悲剧,使悲剧不仅让人们从中引以为戒,吸取教训,而且能给人以生活的力量,催人奋进,以顽强的毅力对待困难和灾难。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明威开创了美国的新现代悲剧。

欧洲文学思潮近代形态的过渡性

作者: 卢铁澎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32-137

文学思潮理论研究是文艺学领域长期以来的荒僻之地,偶有涉足者却鲜能持续开拓。从根本属性而言,文学思潮不是逻辑归纳的抽象类型,但从历时状态考察,则可见其历史形态的客观性。忽视历史形态的研讨,文学思潮问题的解答就无法摆脱概念游戏的窠臼。在文学思潮的所有历史形态中,近代形态尤其复杂,更有必要深入辨析。该文以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争议为中心,探讨文学思潮近代形态的主要特征。“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持论者断言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思潮,而把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贬为非文学思潮,从而无视文学思潮的近代形态所普遍具有的过渡性历史特征。这种过渡性表现为文学思潮主体意识的自发与自觉交织,文学思潮构成的配置仍以创作、接受思潮为主流,虽然出现了与自发型文学思潮对立的新规范,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原有规范体系的限制,新旧思想既互相冲突又相互依存。“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的代表人物波斯彼洛夫正确地认识到,文学基本特征的阐释离不开对文学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发掘;而前者的阐明,也有利于后者的研究,两者相互依存。但在文学思潮的理论研究中,波氏并没有彻底贯彻这一科学思想,从而在文学思潮特征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研究方面得出了片面的结论。因此,只有摆脱“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狭隘视野的囿限,我们才有可能从宏观、系统的历时维度上发现文学思潮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认近代文学思潮所具有的“亦此亦彼”、“或此或彼”的过渡形态,更有效地把握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规律性,促进对文学思潮基本特征的深入认识。

文艺学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

作者: 张锡坤, 路静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69-77+159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构相当艰巨而烦难,有很长的路要走。其立足点当建

立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接受美学互补的基础上。朱良志的“审美意象体系构架”，可视为就此展开思考的先导。从此构架出发，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1)“生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出发点，探讨生生之艺的接受观念，有两条线索，一为中国古代的阐释传统，一为中国古代的文本理论，两个传统在中国古代言—象—意的接受理论中得到了精湛的描摹和呈现。2)作为重要的西方美学体系，接受美学、阐释学与中国古文论颇有相通契之处：都注重理论体系的动态整体性、都采用一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都具备鲜明的创生性；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两者都以“本真存在”为终极依据。而对接受美学的深层探讨，可以补中国古代接受论之不足，接受美学自身的局限性亦可以在“中国化”的历程中得到补救。3)中国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的建构需紧紧围绕着“意象”这一核心范畴，还原“象的流动与转化”的动态整体图式。其中，各范畴和理论均统照在“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范式中，互相又各有理论的纵深，互相之间既相互联系而又存在重叠和交叉。

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变

作者：周宪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26-134

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和后现代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因此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现代范式建立在启蒙精神的基础之上，强调普适价值和理性原则，彰显文学的语言审美功能；而后现代范式则更偏向差异性的价值观，更关注文学的政治意义。两种范式相互纠缠抵牾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不和谐音。反思这一范式的冲突，如何超越现代/后现代的对立，探寻文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路向，乃是当下理论界需要思考的难题。

论中国古典诗学譬喻性的传统

作者：姜玉琴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97-107

中国古典诗学是西方诗学传统之外的另一种理论阐释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古代诗论家认识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诗论家看待事物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关系，而是一对二、对三甚至对无数的复线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在建构中不可能采用西方诗学所惯用的那种直言其事、就事论事的逻辑推演手法，而是在更为灵活多变的譬喻性话语体系中寻求发展，形成一种既能把“意”很好地抒发出来，又决不能被“意”所束缚的“睹影知

竿”的理论谱系和传意传统。如何把古典诗学传统引申、融会到现代、当代诗学中来,是我们今天创造民族诗学所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不管是引申还是融会,其前提都必须是对古典诗学的概念、范畴及特点有一个正确的解读和破译:古典诗学的理论性、体系性不是以炫耀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为价值体认的,它就像一位看透世间把戏的智慧老者,三言两语就能切中要害,没有必要去喋喋不休。与西方诗学相比,这是两种不同人生阶段和哲学境界的诗学,没有孰高孰低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

论中国文论的三部曲——兼及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

作者:顾祖钊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92-100

“五四”以来,中国文论明显经历了“全盘西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目前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已做好了三项理论准备:“新理性主义”在价值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中西融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突出了中西融合的任务和方式;“中国式文化诗学”是中西文艺理论融合之路通过上述二者实现创造性建构和超越的最终模式和必然归宿。揭示了这样的“三部曲”,也就揭示中国文化诗学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以预测中国文论的未来。

崇简尚韵的意境营造——古代小品文对确立文学叙事的意义

作者:李翰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08-118

作为一个文体名目来说,小品文在现代才出现,但其实际历史却很悠久。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出现了小品文的第一次高潮,历经唐宋而在明季达到鼎盛。从写作上说,小品文崇尚简洁,重视情韵,既受史著尚简笔法的影响,同时也与玄学简淡玄微的旨趣相关。其哲学渊源,实为庄玄,提倡人生的艺术化,追求个体的自得自适。这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还文章以审美、娱乐功能;而就审美特征而言,便是崇尚简约,重视情韵。二者一在文用层面,使应用文字变成审美文字;一在审美层面,以意境作为散文叙事的重要特征,从而区别于小说叙事的以情节冲突、性格成长等为主要特征,在古代散文从应用叙事走向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对散文文体的确立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作者：罗钢

来源：《文史哲》2012年第1期 5-21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游戏精神：再造童年和自我超越——论童年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

作者：李学斌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75-84

广义的“儿童文学”中，童年文学特指为小学阶段儿童提供的、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童年文学的价值核心是游戏精神。它是作家在“自我表现”与“再造童年”基础上，对儿童读者的审美呼应、精神引领；它通过“出走”与“回归”的叙事结构实现其内在的游戏效应；并最终借“顽童”和“能者”的形象达成完满价值实现。基于此，文章认为，童年文学的游戏精神不仅在于描绘、传达儿童成长中的愿望和体验，更在于通过对童年文学游戏效应的自觉追求，参与儿童的心灵建构，最终实现童年人格审美塑形与内在自我的精神超越。

审美形式、文学虚构与人的存在

作者：马大康

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33-41

审美形式、文学艺术虚构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联，是随西方现代化进程而凸显的，是现代主义文化英雄的精神建构。审美形式既是文学艺术虚构世界的构建者，又是引领人进入这一世界的向导。但是，后现代社会对种种边界的瓦解，特别是电子媒介和现代复制技术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对文学艺术构成了严峻挑战。历史元小说则深入反思了文学叙事、历史叙

事及虚构问题，为人冷静面对自身存在和文学的命运提供了重要启示。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作者：曾军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13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教育研究导航

高等教育

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模式——对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文化逻辑解析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44-152

作者：王洪才

论文指出，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命题，回答它对于建设高教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研究发现，解答露丝·海霍教授命题必然面对两大难题，一是要确立创办中国大学模式的理想模型，二是要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所指。海霍教授命题所遵循的是一种多元文化逻辑，其中包含了“超越说”与“对话说”，而且两者是冲突的。海霍教授命题的核心是“对话说”，而在现时代实现平等对话是困难的。求解海霍教授命题的最大难题则是如何寻找建立中国大学模式的突破点。在一个充满价值冲突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崇尚“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这既是求解多元文化冲突的方案，也很可能是中国大学模式建设的突破点；中国大学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社

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大学制度改革目标探析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53-160

作者：王长乐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世界性的教育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高度的文化共识和共同遵守的思想原则。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可以有体现本土特色的“中国特色”，但基本原则应该与世界大学制度没有冲突，应该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能够令人信服。而我国目前流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则明显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无法使大学脱离传统的工具性质，实现本质性进步。我国大学从创办至今都没有成长起自主、独立意识的现象表明，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将是一场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变革，其成功既需要大学内外的思想共识，更需要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作者强调改变国家大学认识的原因在于，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先进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坚定的行动。而国家层次上的拨乱反正行动，是需要以明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念做支撑的。

对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因素的思考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27-136

作者：邹晓东

大学制度是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它是以现代大学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处理大学与大学外部（政府和社会）关系，同时也包括处理学校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种规范的制度体系，其实质就是大学的组织体系、管理体制、学术治理结构及其相应的运作机制。在大学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诉求。论文指出，从内在制度构建来看，应围绕“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大学章程”等关键词做文章，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教学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管理架构，积极推进内部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及各方面工作体系的改革创新。

“问题”抑或“主义”——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争论与反思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37-141

作者:魏宏聚

论文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真正开始以来,“问题”取向与“主义”取向一直就是学界争论的研究价值选择的问题。该问题争论的本质是,高等教育研究竟应该关注实践问题还是应该关注学科建设问题。随机抽取两个权威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高等教育研究》(武汉)与《江苏高教》(南京),对这两个杂志2010年所设栏目及发文属性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问题”取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研究的主流;“主义”取向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存在着先天不足与种种弊端。由此来看,研究的“问题”价值取向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英国高等教育入学政策:扩招与公平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5-18

作者:李贤智

论文指出,英国高等教育在从精英教育迈向大众化、普及化的进程中,英国政府及高校通过制定走向扩招的入学政策、探索多元入学途径、建立招生服务机构,形成了以扩大参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入学政策。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通过立法保证公平入学,并通过成立公平入学办公室、建立公平入学论坛、采取经费资助入学等方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平入学的政策。英国高等教育的这种扩大参与、公平入学者二者兼顾的入学政策取向,为英国院校的入学政策带来巨大影响,也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公共选择倾向——从撒切尔到布朗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9-21

作者:罗泽意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从撒切尔政府开始具有较为明显的公共选择倾向,它们主要体现在注重绩效、减少特权、强调公平。分析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公共选择倾向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1)在大学外部应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决策,构建大学治理结构,凸显政策制定的联合性;(2)大学资源获取依靠的主要是“分配”而非竞争,引入竞争机制以

提升大学绩效；(3) 教育的不均衡元素会产生“代际传递”，对地区经济不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影响将是持久而深远的，应加大推进高等教育公平力度。

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现象”之比较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9-92

作者：李慕雪，刘要悟

后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其显著特征是非传统成人学生数量超过其传统适龄青年学生的入学增长。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现象之异同分为三个方面：(1) 精英为主与类型多样：双轨单进还是相辅相成；(2) 适龄青年与成人学生：大众化之“大众”为什么人；(3) “通儒”模式与“开放”体制：注重“连续”还是注重“回归”。通过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现象的比较，可以借鉴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应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实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目的。(1) 以“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理念为导引，保证成人学生在高等教育比例的逐步增大；(2) 以体现“开放”、“多元”、“回归”为特征，力求以结构的多元化满足社会需求的多样化；(3) 以扩充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为根本，使得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能肩负起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重任；(4) 以教育质量的保障和提高为重心，扩充教师资源，减免精英教育机构所承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重点大学不能盲目扩招，传统型研究大学要以学术研究为主，准确定位各类型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教育政策提供证据——当前英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2-17

作者：桑锦龙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政策对于公众的利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充分考虑教育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如价值追求）、政治因素（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和博弈）和经济因素（如教育投入状况）之外，将教育政策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就显得非常重要。论文以21世纪以来的英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相关情况为例，探讨教育政策研究在英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分析研究支撑教育政策的三个案例，并评述“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理念及实践。英国有关研究与教育政策制定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特别是“基于证据

的教育政策”理念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对于强化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建设、提高教育政策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础教育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的特征及其文化阐释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54-158

作者：李广，马云鹏

论文指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特征表现为：重视“双基”训练，忽视个性化学习；重视逻辑思维培养，忽视感性素质开发；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忽视现实生存能力培养。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在文化自闭与文化迷失中曾出现了偏颇与失衡，又在文化开放与文化自觉中不断进行自我建构、发展与超越。作者认为“文化自觉”其内涵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文化认同，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之下对自身文化的自知和自信。第二，文化反思，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与世界其他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第三，文化超越，通过文化变革与更新完成文化的自主适应，从而超越旧有文化。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建立在对民族课程文化认同与认知的基础上，在面对时代与社会剧烈变革的反思中，对世界其他民族优秀课程文化比较与借鉴中进行的主动探索、自主适应与不断超越。

新时期基础教育校际师资均衡：本体、必要与可行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77-181

作者：崔国涛，张聪

论文指出，新时期校际师资均衡问题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厘清其内在逻辑、辨明其基本表征尤为重要。基础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公平、“择校”现象、提高教育质量都需要实现校际师资均衡发展。作者认为推动基础教育校际师资均衡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以政策与法律的完善保障基础教育校际师资均衡发展；（二）以丰厚的教育理论基础引领基础教育校际师资均衡发展；（三）以区域性实践带动整体性的基础教育校际师资均衡发展。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来源:《上海教育》2012年第1A期 48-49

作者:王厥轩

论文指出,家庭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培养方式的变化,今天的校长和教师为了学校的声誉,为了对得起家长和学生,在培养目标上太注重成绩、分数、升学率。但是社会和学校的评价的标准本质上是两码事。倘若把学生分成“学习世界”、“生活世界”、“心灵世界”,现今学生的“三个世界”整个地围绕反反复复的训练,这就造成了几个方面的错位:(1)相当一部分家庭在孩子读书的时候,把今天的读书和未来的前途、职业捆绑起来,这个捆绑对儿童青少年是痛苦的。(2)很多的家长期望值太高。(3)现在的孩子不会规划自己。作者认为以上三个错位,既有学校教育,也有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

论我国基础教育的五种主体形态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1期 23-30

作者:张荣伟

确认改革的主体形态及其结构是有效推进基础教育的必要条件。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根据成员身份不同以及在改革目的、性质、内容、方法、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将推动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主体划分为“政策规划型主体”、“理论建构型主体”、“实践突破型主体”、“商业炒作型主体”和“社会公益型主体”五种形态。探讨这五种主体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特征的根本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认知框架,进一步明确基础教育改革的多元性、差异性和互补性,从而为强化不同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促成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提供总体思路。

普适与朴素:基础教育教学创新的品质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1期 31-37

作者:杨启亮

普适与朴素是一种教育品质。基础教育教学创新应该摒弃浮华与文饰,回归普适与朴素。因为基础教育只是终身教育的基础,它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确立普适与朴素的培养目标。基础教育只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但这也是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有机会杰出的基础,应该设置普适与朴素的全面课程。基础教育教学创新只是为基础而

创新，应该选择普适与朴素的教育教学创新方法。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个假设

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1

作者：耿申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办学条件的统一配置，使所有同类学校在同一基础上展开教学活动，使所有的孩子在任何学校都能享受相同条件的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管理目标是通过条件（经费、设施设备和师资等）薄弱的学校施行大力度的倾斜投入政策，在硬件设施和师资联合队伍方面逐渐趋于统一。由此，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假设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的工作更具可操作性。首先，假设一个“政策区域”内的义务教育学校间毫无差异。这种现象说明教师缺乏基本的教学经验积累。综合起来则表明该地区的教育发展比较落后。其次，假设一个政策区域内的义务教育学校间核心差异超过20%，这主要说明政府的教育政策有了偏差，执行了以投入为核心的非均衡政策或反均衡政策。第三，假设一个政策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间的核心差异在10%—20%之间。倘若上述三个假设成立，从义务教育法的角度看，则意味着一个政策区域内的学校之间的差异。80%—90%的责任应由政府政策来解释，10%—20%的责任应由校长和教师的努力来解释。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特征及其文化阐释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154-158

作者：李广，马云鹏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特征表现为：重视“双基”训练，忽视个性化学习；重视逻辑思维培养，忽视感性素质开发；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忽视现实生存能力培养。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在文化自闭与文化迷失中曾出现了偏颇与失衡，又在文化开放与文化自觉中不断进行自我建构、发展与超越。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建立在对民族课程文化认同与认知的基础上，在面对时代与社会剧烈变革的反思中，对世界其他民族优秀课程文化比较与借鉴中进行的主动探索、自主适应与不断超越。

课程·教材·教法

我国知识教学面临的三大挑战与理论回应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5-17

作者:黄华

随着我国第八次课程改革的实践推进,学界围绕着理论与现实存在的“轻视知识”思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概括地说,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知识教学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冲击;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勃兴;有现代和后现代夹击堵截、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同步推进的现实国情。这三大挑战在知识教学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现,对知识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全主位的要求。作为理论回应,我们在本体论上要坚持系统传授——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这一基本理论主张,在知识的“质”和“量”上审慎选择,同时积极有效地统领和科学提升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的各种认识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在方法论上坚持多样综合的行动策略,对知识教学的具体实现机制加强研究,不断优化传授——掌握知识的过程;在价值论上坚持科学、高效、人道的基本诉求,同时因地制宜,避免单打一、一刀切等极端主张和做法,实事求是地向着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前进。

中国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学为导向”综合型课堂教学模式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8-24

作者:王文静

在促进我国教育公平和内涵发展的进程中,教学模式的改革是关键。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则是推动教学模式改革顺利实施,最终实现教学效能最大化的重要环节。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是人们以一定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在真实、复杂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把一个概念形态存在的抽象教学模式变为一个以物理形态存在、可视和可操作的教学模式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教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依然在不同学段存在,且严重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成效。针对教师教育领域职前教师“学了教学设计不会教学设计”的突出问题,我们尝试以“深度学习”为理念,在基于设计的研究范式指导下,以《教学设计》课程为平台,构建旨在提升职前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学为导向”综合型课堂教学模式。研究表明,通过在真实、复杂的课堂教学情境中开展持续两年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实验,“学

为导向”综合型课堂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职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综合素质，其自身也在“迭式循环”中得到了持续的优化与完善。由此，我国教学模式改革要以科学的研究范式为指导，要以人类学习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要进入教育现场进行综合持久的实践行动才能达到目标。

论教师的教材加工能力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8-64

作者：张莉，芦咏莉

教师教材加工能力是教师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经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及时洞察学生特点，运用不同形式的思维，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分析、概括、生成与反思的能力。从加工内容看，教师教材加工能力体现在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差异；从加工过程看，教师教材加工能力反映了分析思维、实用思维和反思思维三种不同形式思维的作用。从加工主体看，个人或集体及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加工主体。教师教材加工能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通过直接和间接经验的积累逐步发展的，经历了从机械加工—常规加工—精细加工—创造加工的过程，具有个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发展性的特点。

将课程曲解为制度性文本：学校实验与八年研究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1期 3-9

作者：（加）威廉·派纳

论文借对《八年研究的故事》的书评，全面回顾和批判了八年研究期间以拉尔夫·泰勒为首课程专家所推行的教育实验。批评八年研究将制度形态的课程置于它的知识本体之上，重视课程重组甚于课程知识的改造，并在强调目标和评价体系的同时，把学科知识贬低为实现外在目的的一种手段，回避了“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这个关键总是为消除八年研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作者指出必须把课程开发视作一项理智性的事业，鼓励教师对艺术、人文、自然和社会科学各领域进行高等研究，并将之视为课程开发的重要任务，同时，必须把理智型实验和制度型实验结合起来，才能为重建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课堂评价的挑战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1期 10-16

作者:钟启泉

论文指出,课堂评价终究是一种检点教学的成败、改进教学实践的活动。新课程改革以来提出了“基于三维目标的评价”的课题。然而,事实上在我国中小学应试教育仍然横行霸道,课堂评价轻重失衡、乱象丛生。作者认为,在评价视点的背后,隐含了实施课堂评价的基本策略:(1)长跨度(2)个别化(3)感悟与经验(4)观察(5)反馈(6)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课堂评价的重心需要从学生学习的量的评价,转向对学生学习的质的评价。定性分析或是质性研究的方法具有如下三个特质——(1)重视在自然条件下的文脉及环境来进行观察;(2)问题与假设并不是预选设定好的实验变量,而是在观察过程之中逐步决定的;(3)不是抓住集团中的平均状态,而是重视每一个人的内部状态、认知处理过程的生万言书学、现象学的分析。当我们的学生不再是单纯的被评价者,同时也成为评价主体的时候;当整个的评价制度彰显了观察儿童的两个视点——“在成长之中”,“在关系之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种课堂评价是名副其实的“教育性评价”。

论有效教学的伦理性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1期 26-29

作者:肖庆华

伦理性是有效教学的固有属性,越是追求有效性的教学,越有必要凸现其伦理性。缺乏伦理规范的有效教学,越是有效,对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损害就越大,伦理性已成为有效教学中急需关注的问题。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平等尊重原则是保证有效教学符合伦理规范的伦理原则,两者共同规约着有效教学的伦理行为。有效教学的伦理实践要求是:(1)构建有效教学的伦理关系。一是构建师生都能从教学中受益的伦理关系,即教学行为要关注教学场域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二是构建平等的伦理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人格应受到平等的对待,这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基本伦理要求。(2)规范有效教学的伦理行为。一方面,教师的有效教学行为要符合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教师的有效教学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3)进行有效教学的伦理反思,一是从教学目的方面来对有效教学进行伦理反思;二是要从教学技术方面来对有效教学进行伦理反思;三是要从师生关系方面来对有效教学进行伦理反思。

论教学方法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1期 17-25

作者:程广文

教学理论受科学范式的影响,出现科学化倾向,致使教学方法在理论体系中具有突出地位,因为它是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中介。就其哲学意义而言,教学方法具有技术性,表征技术性的是它的目的性和程序性。科学化的教学理论意欲通过教学方法来“操作”教学过程,让方法的程序性来保证方法的目的性。但是,教学方法在教学活动中具有内在性悖论和外在性悖论。教学方法的实践境遇也确证了两悖论的存在。内在性悖论主要表现在教学方法试图通过“程序”来培养人,而人无法靠“程序”来培养;外在性悖论主要表现在教学方法作为实践的技术,其面对的工作对象则是一种复杂系统,而教学方法属于“简单化的范式”,难以应对复杂性对象。因此,从复杂性角度看,有必要对教学方法进行解构。这必须回归到教学方法的原始发生处,回归到人的生成之域。人在生活世界中成长,而在生活世界中,交往是人成其为人的基本路径。结合教学的制度化,在课堂教学中对话是教学活动得以展开的基本机制,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

西北农村地区新课程适应性的纵向研究——基于 2003 年与 2011 年调查的实证分析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1期 3-11

作者:王嘉毅,赵志纯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两个阶段的纵向研究对比,笔者探讨了西北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成效与问题。研究发现:教师对新课程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对课程改革的认同度较高;新课程在西北农村地区的适应性稳步提高;新教材在西北农村地区的适应性显著提高。当前,新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师缺乏专业引领,评价改革滞后,教师培训不到位,课程资源匮乏,上级部门不够重视;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存在一定难度;现行教材练习题难度过大、习题量过少,配套练习内容陈旧、与教材不配套,教材城市化,教材编排次序、教材难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

十年教材建设:成就、问题及建议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1期 12-16

作者：靳玉乐，王洪席

论文指出，中小学教材建设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工程，在我国教育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教材建设不仅有利于彰显国家意志、延续文化传承、推进学科发展，而且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养成以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积极作用。新课程改革以来，中小学教材建设在教师教材观转变、教材政策的逐步改进、教材管理制度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遭遇到了教材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多样化格局下的无序、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应用不充分等流弊与困境。未来的教材建设应加强教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推动主流教材的形成、促进教学方法的同步变革、建立科学的教材评价体系，并开展后期培训，实现教师对教材的创造性再开发。

论实践教学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1期 17-22

作者：郭元祥

实践是人的成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教育性实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中心，有目的地运用所学知识，在实际情境中认识与体验客观世界，并基于多样化操作性学习过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活动。教育性实践是体验性实践、反思性实践、综合性实践，具有体验性、反思性等基本特点；实践教育的基本过程是情境理解、过程体验、反思感悟，其过程价值在于发展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和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加强实践课程、注重实践学习、构建实践德育、是当前我国促进人才培养方式创新的根本要求。

心理发展科学

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培养模式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6-41

作者：林崇德，胡卫平

论文指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由自我探索期、集中训练期、才华展露与领域定向期、创造期、创造后期五个阶段构成；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关键发展阶段是指引这五个阶段的三种主要影响因素；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和创造性社会背景是三种重要的创造性素质；营造创造性环境、实施创造性教育、培养创造性能力、塑造创造性人格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课堂教学创新模式、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是

三种有效的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

利用测试促进学习：记忆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与教育启示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3-50

作者：罗良，张玮

论文指出，记忆心理学研究发现，测试不仅是评价先前学习效果的手段，它还可以改变长时记忆中的信息。与简单重复学习相比，学习过程中进行一次或几次不给予任何反馈的测试能显著促进学习长时保持。测试对学习的促进获得了多方面实验证据的支持，对此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包括侧重于理论机制的记忆失用新理论和强调内在机制的精细提取假设。影响测试促进学习效果的因素则包括了测试次数、测试间隔时间、测试形式及测试后反馈等四个方面。在当前教学实践中，需要重视测试本身对学习的促进作用，如教师要学会合理利用课堂测试，培养学生学会和使用自我测试的学习策略，在设计教材与各类辅导书中的习题以及开发多媒体学习软件时要充分利用测试促进学习研究的发现等。

自我增强取向下的亲社会行为：基于能动性和社交性的行为路径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1-57

作者：张庆鹏，寇戣

论文指出，人的自我增强需求既要提升自身积极品质和个人价值感，又要通过关注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我和社会之间的整合和适应，从而提升社会价值感，这种自我增强需求在特定情境下通过能动性和社交性两条路径促进亲社会行为。在能动性方面，助人效能感和自主性助人动机是两个重要因素。助人效能感促进亲社会行为方面，个体对行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公开性的知觉，以及对“施助者—受助者”双方的关系表征，或者对亲社会行为意图均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评估的理论模型建构与验证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65-72

作者：邹泓等

在整合已有理论和实证成果的基础上,从关键性任务分析和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将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评估指标划分为内容领域和功能状态。通过开放问卷调查进一步确定了评估社会适应状态的四个具体领域,并据此编制自我报告问卷进行验证。在对全国2314名中学生所填写问卷进行分析后,形成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问卷最终共50个项目,包括自我肯定、自我烦恼、亲社会倾向、社会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等8个一阶因子;分为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4个领域,以及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种功能状态。经多质多法模型的交叉验证分析,问卷的二阶结构与理论模型拟合较好,可以从四个适应领域和两种功能状态考察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初步验证了社会适应状况评估的领域—功能理论模型。

竞争与情绪对顿悟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

来源:《心理学报》2012年第1期 1-13

作者:李亚丹,马文娟等

本研究以汉字字谜为材料,采用“原型学习—问题测试”范式,考察不同竞争水症(高、中、低竞争强度和无竞争)情境下诱发的情绪效价(积极、中性和消极)对顿悟中的原型启发的影响。结果发现:1)竞争水平对字谜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有显著影响,低强度竞争水平最有利于靶字谜问题的解决,中等强度和高强度下效果次之,无竞争条件下效果最差;2)诱发情绪对靶字谜问题解决的原型启发也有显著影响,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比积极情绪下靶字谜的正确率更高;3)有无竞争与情绪效价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体现了竞争和情绪这两种动力相关因素在原型启发中的动力作用不是独立的。

内隐与外显记忆编码阶段脑机制的重叠与分离

来源:《心理学报》2012年第1期 30-39

作者:孟迎芳

论文指出,记忆包括编码和提取两个重要阶段,以往研究多关注内隐和外显记忆在提取阶段的脑机制分离,那二者在编码阶段的脑机制是否不同?为探讨这个问题,该实验采用两阶段的迫选再认方式,把学习项目区分成三类:随时后被选择且告知为见过的项目(记住),随后被选择但告知为猜测的项目(启动)以及随后未被选择的项目(忘记)。结果表明,从200ms开始的颞区负走向Dm效应为内隐记忆(启动Vs忘记)所特有,反映了对刺激的知觉加工过程,而400-500ms前额区正走向的Dm效应为外显记忆(记住Vs忘记)所特有,

反映了对刺激的精细加工过程,而 200-300ms 中央区及 600ms 开始的顶区负走向的 Dm 效应为两种记忆类型所共有,它们分别反映了对刺激的注意状态以及把编码后的刺激信息登记进相应记忆系统的过程。因此,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在编码阶段的脑机制既存在着分离,也存在着重叠的现象。

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情感调节还是执行控制受损

来源:《心理学报》2012年第1期 112-1210

作者:陈雪军,黄月胜等

本研究结合经典的自传体记忆测验(AMT)和反转—自传体记忆测验(AMT-R)探究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的原因。首先通过创伤事件终身经历问卷—学生版(CROPS)对630名青少年进行筛查,然后结合访谈,并采用儿童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CRIES)测量创伤程度,最终选取有创伤后症状的青少年63名,分为高创伤组和低创伤组,另无创伤经历的青少年30名作为控制组。三组被试均参加AMT和AMT—R实验。结果发现,在AMT中,创伤青少年表现出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的特点,且创伤后症状越严重,具体性减少越明显;在AMT—R中,创伤青少年提取的具体记忆数量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的减少是情感调节的结果。

什么是好的理论?基于理论心理学的视角

来源:《心理学报》2012年第1期, P133-137

作者:叶浩生,汉克·斯塔姆

论文在 Hong,Chao,Yang & Rosner(2010)的基础上,从理论心理学的视角继续探讨了“什么是好的理论”。作者认为,在传统经验主义的视野中,好的理论必须根源于经验,从经验观察中进行提炼和抽象,并最终由经验事实来进行证实或证伪。(1)理论是对事实的归纳与概括;(2)理论是对事实的解释;(3)理论是实验假设的来源;(4)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知识可累加的过程。但是,随着哲学、心理学的发展,当代人们关于理论的看法正在逐渐进入后经验主义时代。作者主要持以下观点:(1)理论不只是经验事实的归纳与概括,非经验的理论思辨本身也可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2)理论具有解释、预测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具有批判与反思的功能;(3)理论不一定是经验事实中的“发现”,还可能是心理学家联盟

的一种“发明”或“共识”；(4) 理论的发展不一定是知识累积式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不同范式之间的转换。在这种理论观下，与经验证据的相符不再是判断“好的理论”的唯一或关键的标准，人们可以在概念与逻辑、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修辞与叙事、应用与实践等不同的层次和水平上对理论展开评价。

学科领域知识和学业成绩对工作记忆广度的影响

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1期 70-76

作者：赵燕，蔡笑岳

本研究引入 Alexander 领域知识概念形成数学学科领域知识，以七年级有理数单元为研究材料，编写问卷和 E-Prime 实验程序，筛选 60 名初中生为被试，考察数学学科领域知识和学业成绩对工作记忆广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 学优生的认知过程知识和问题条件知识显著高于学困生，而学理内容知识差异不显著；(2) 在简单加工任务上，学优生和学困生工作记忆广度差异不显著。在复杂任务上，学优生的工作记忆广度都显著高于学困生；(3) 当工作记忆广度任务中存储部分的词语和数学学科领域知识相关时，问题条件知识分数和认知过程分数能够显著地预测工作记忆广度。而不相关时，仅问题条件知识分数能够显著地预测工作记忆广度。

历史研究导航

古代史

《周礼》“六计”与战国时期的官吏考课制度

作者：朱红林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52-58

考课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都不同程度地追溯到《周礼》中的“六计”。但学者们对《周礼》一书所反映内容的时代，定位各不相同。如把《周礼》所反映的考课制度定在西周时期就显然不合适。《周礼》一书尽管记载了很多西周春秋时期的职官名称，但是其管理方法却完全是战国时期的风格。《周礼》“六计”制度的形成正是战国时期官吏考课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标志之一。“六计”只是《周礼》

官吏考课总体概括的六项指标,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考核内容和标准。

《周礼》所反映出的考课制度已经系统化、常态化,有日考、旬考、月考和季考,也有年度考课和三年大考。从考课的频繁程度及涉及部门的广泛程度而言,《周礼》所反映的考核制度只有到战国时期才较多地在各国出现。《周礼》作为一部讲制度的书,它所记载的战国时期官吏考课制度,虽有对西周春秋时期制度的追溯,更多地则是对战国时期列国制度的采摭,并经过了作者一定程度理想化的归纳。所以它虽不可能在某一国完整地实施过,但其中不少规章却能从许多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证。

秦汉时期齐鲁贵族迁徙关中考述

作者:贾俊侠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9-44

经过秦汉时期的10余次移民,大量的关东移民被迁入关中地区。在迁徙的人口中以六国贵族后裔为主体;六国贵族后裔中,齐楚两国是主体;齐楚贵族后裔中,齐国诸田是主体。同处于齐鲁文化圈内的齐国诸田再加上齐国诸姜、鲁、宋、邹、卫等国移民人口在迁关中的移民中占了绝大多数。迁徙手段主要采取政令强迫,同时也以赐钱、赐物、赐田宅以及免除赋税等优厚的经济利益以诱惑;迁徙的目的主观上起到了增加关中人口、充实诸陵邑、加强对旧贵族势力控制的作用,客观上发展繁荣了关中经济,促进了东西部文化融合,尤其是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

作者:宋杰

来源:《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 31-41

项羽作为国君和统帅,在确定战略方针时未能考虑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以致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例如选择资源匮乏、无险可守的“梁楚九郡”做根据地,建都彭城,而没有占据形势完固、物产丰饶的关中,结果其后方屡次被汉军攻破摧毁。他将主攻方向放在狭窄的豫西通道,无法展开兵力,发挥擅长野战的优势,致使刘邦得以集中人马成功地对其实施阻击。项羽对关东的韩、赵、魏、燕、齐等地区未予足够关注,没能实行有效的控制并征发那里的人力、资源来补充自己。尤其是对号称“东秦”的齐地举措失当,导致上述各地被刘邦轻易占领和利用,使楚汉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逆转,造成了项羽的最后失败。

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

作者：赵俊杰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59-65

3世纪后叶以来，随着高句丽势力的南下，原居住在乐浪郡的汉人集团已经出现向带方郡南移的态势，而4世纪前叶乐浪、带方二郡的覆亡则加剧了汉人的逃亡。残余的汉人集团于带方郡故地的黄海南道北部逐渐形成聚居区，加之此时中国北方大陆的汉人新移民也不断迁徙至此，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朝鲜半岛西北部汉人集团势力在4世纪中叶出现短暂的中兴期。自汉武帝越海平定朝鲜设立四郡起，以乐浪郡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就成为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中心分布区域。但是，四郡设立之后就不断受到周边土著民族的侵扰，临屯、真番旋即被废，玄菟历经两次内迁，乐浪虽能自保一隅，领地亦有较大收缩。总体而言，两汉时期朝鲜半岛西北部汉文化分布范围逐渐缩小，势力也呈渐趋衰落的态势。至东汉献帝建安（公元196—220）年间，公孙氏以乐浪屯有县以南荒地开带方郡，虽使汉文化势力一度中兴，却也仅是昙花一现。二郡最终于公元313年、314年相继覆亡，中原政权也随之失去了对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权，此后文献中只有关于该地区只鳞片爪的记载。本文试图以考古资料为中心，来探讨二郡覆亡前后1个世纪内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汉人集团的动向及其势力兴衰。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此时期带方故地的汉人分为原二郡遗民集团与内地新移民集团两大系统就会发现，汉人聚居区的中兴实际上主要依靠了后者的力量。随着此后高句丽重又加强对南境的经营，汉人聚居区的安定被打破，两大汉人集团系统的动向也有所不同。原二郡遗民集团汉人再次大规模向南出逃，很大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半岛南部最终于5世纪初到达日本。4世纪后叶汉人聚居区墓葬中纪年铭砖的烧造急剧减少并终结于5世纪初的现象，正与此相合。与此同时，内地新移民集团的势力则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得到长足发展，5世纪初以后于平壤西南的南浦一带形成另一个大型汉人聚居区，并在长时间内维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

作者：朱溢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75-84

太庙祭祀在中华帝国礼仪制度中的重要性，仅次于郊祀礼仪。在太庙祭祀的发展过程中，两汉之际的儒家化改革最具转折意义，“天子七庙”观念的引入、迁毁制度的建立、太庙同殿异室模式的形成、一年四时致祭和禘祫殷祭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后来近两千年太庙祭

祀的基本面貌。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祭祀制度的变化非常剧烈，禘祫礼仪也不例外。经典记载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前者在制度层面的落实相当困难。如何在经典与现实之间进行调适，是礼官和其他文官面临的难题，经典文本的不同解读和当下形势的种种需要，更加剧了礼仪制度制定和调整的复杂性。正因为这样，禘祫礼仪在这一时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面貌因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唐至北宋时期禘祫礼仪的争论和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通过东向之位的争论，汉魏以来太祖以上的殿庙之主不预禘祫的制度遭到了颠覆。在晚唐，这些神主在兴圣庙参与禘祫，到了北宋，已经能够合食于太庙，熙宁以后，追溯到的最远祖先僖祖更是取代了太祖，在禘祫礼仪中长居东向之位。二是别庙皇后参与太庙合食的程度加深。因为夫君健在而暂居别庙的皇后神主参与禘祫的问题，到了晚唐有了明确规定，以祔于祖姑之下的方式合食太庙。魏晋以来长居别庙的皇后神主遥祫的成例在唐末被打破，到了北宋，那些无望升祔的皇帝元妃和继后长期参与太庙禘祫合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她们无法进入太庙的一种补偿，直到元丰年间，四后的祔庙出人意料地解决了她们合食太庙的问题。三是禘礼废除。汉魏以来在神位上将禘、祫几乎等同的观念和制度，在元丰年间遭受质疑，禘礼被认为是祭祀远祖的礼仪，与合食于僖祖室的祫礼不同。既然僖祖以上的祖先已经不可追溯，禘礼就遭到了废弃。以上这些变化说明，唐至北宋时期的禘祫礼仪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魏晋以来礼制和礼学的束缚：尊崇正统、体现名分的功能有所淡化，敬奉祖先、着眼本宗的考量不断凸显；汉魏礼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已经无法左右礼制的调整，现实需要和经典的当下解读才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禘祫礼仪呈现出与过去迥异的特质。

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

作者：唐雯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5-94

该文通过行状这一唐代官员身后最早形成的记述其一生功过事迹的文体在谥议、神道碑、国史本传中的层层演变，展现了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对于官员死后形象的刻意塑造。而这一君臣之间的互动过程，造成了流传至今的史料丰富的层次性，而在这些多层次的史料的罅隙间散落着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在唐代社会中，作为一个读书以求仕进的士人，一旦踏上仕宦之途，就不可避免地嵌入到庞大的国家机器之中，生命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既有制度无所不在的约束，即使在生命终结之后，国家仍旧用一系列程序规范着逝者后事的处理，并通过赠官、谥号、神道碑铭及国史传记等种种手段决定着逝者身后的荣辱与其后世的声名，以此体现在君臣体系中君上对于臣子无可置疑的终极控制。因此唐代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在去

世之后,朝廷与丧家之间如何互动,官方又通过怎样的方式对死去的臣子展示其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力,唐代的制度都有着详细的规定。而在社会实践的层面,这些制度的运作过程同样深受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左右,而这一切的合力最终塑造了官方话语系统中死者的身后形象。该文即拟通过对唐代大臣去世之后一系列制度、程序的梳理,结合史料中这些制度的运作实况,展示君臣体系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体制如何在官员生命的终点对其一生的功过加以最终而且影响深远的背书,而身处其中的官员及其家属又如何在此制度的缝隙间辗转腾挪,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以塑造符合当事人利益的身后形象。这种君臣上下在官员身后的一系列互动在相当程度上构建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唐代历史。

明清县域地图与地方地理认知——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域地图的分析为中心

作者:董枫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95-102

地方志中留存有数量可观的县域地图,这些地图通过强调或缺漏等手段向地图阅读者传递着地图绘制者对当地的地理认知,体现着绘制者对县域社会的关注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图中所反映出的地理认知也在不断变化。该文通过对泰顺县明清以来的四幅县境地图进行对比阅读,结合地方文献和时代背景,探讨县域地图记载内容的差异,解读其中包含的时人的地理认知与政治关切。在今天留存下来的古代县域地图中,有相当一部分收录在地方志之中。县域地图能够成为方志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因为这些地图可以将地方信息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传达给阅读者,从而帮助阅读者迅速地形成空间感,在没有深入实地的情况下,仍能对空间情况有总体性的认识 and 把握。阅读地图时人们常常产生疑问,中国绘图技术早在魏晋时代就有“制图六体”的提出,11世纪绘制的《禹迹图》也较为精准,为何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绘制的地图往往都失于粗略?通过对四幅县域地图的校读可以看出:即便对于同一县域,其地图绘制亦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显然,地图无法承载人们所有的地理认知,只能体现其中的一部分,县域地图在绘制的时候对地理认知进行了选择。方志地图的粗略与军事地理认知的详细之间有强烈的反差,可见地方志中的地图只反映了一部分地理认知,县域地图的这种地理认知选择是与其绘制目的和服务人群密切相关的。潘晟通过对明代方志中地图编绘意向的研究认为,相当数量的陈述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无论是形象地认识地方的地理形势,还是了解地方民情风俗,以地生民,其表达的都是按图施治的主观意向,其陈述的阅读对象则主要是努力服务于王朝统治的地方官吏。这也意味着明代方志

中的地图反映着地图绘制者和授意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预设的事务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所在。正是因为这种“实用主义”的需要使中国的许多地图强调示意,而非精准地标注。换言之,地理认知的选择造成了县域地图间的差异,而造成地理认知选择差异的原因则与地图绘制者的目的和其本身的地理认知密切相关。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作者:赵世瑜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63-74+160

明代中叶被朝廷视为大患的“北虏南倭”问题,长期以来即受到明史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南倭”问题已被置于明中后期(16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海上贸易发展的大背景下去重新诠释,但发生在同时期的“北虏”问题,却仍在传统的游牧民族南侵的解说框架下得到叙述。本文希望,在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与世界的整体面貌和关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前提下,对发生在长城内外的相关事件重新加以解说,并试图发现“北虏”与“南倭”问题之间的历史联系。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

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作者:孙邦金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9-45

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长期致力于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直接影响到了乾嘉学术向证实、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证明乾嘉考证史家群体性的“史纂”、“史考”之学背后隐藏着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形上学。这一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主张把史学从唯道德主义偏颇中给解放出来,整体表现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近现代史

清末留日学生与地方督抚间的政治博弈——以留日陆军士官生为中心

作者：陈芳

来源：《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 38-45

甲午战争之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将强兵与教育当作富国图强的第一要务。基于人才匮乏，选择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试图借助日本的教育资源作为解决瓶颈的捷径；事与愿违的是留日学生迅速觉醒，他们种种“反叛”行径使督抚们的名誉声望和辖区统治受到严重挑战。为此，张之洞等采用加强行政管理、严格选送学生、强化政治思想监控、参与制定留学生的考核办法和恩威并重等策略与留日学生展开政治博弈，但是，学生们的革命思想日渐成熟，在满、汉矛盾加剧的政治环境下，在辛亥革命前夕，这场政治博弈胜负已经底定。

从学潮走向政潮——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研究

作者：贺江枫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90-103+160

作为非中共主导的反政府学潮，“七五”惨案因《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而起，其后东北流亡学生游行遭北平当局镇压，死九人，伤二十一人。东北民众在地域情结与现实困境的共同作用下，掀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得学潮逐步向政潮演化。傅作义对惨案善后主张“忍耐”政策，陈继承力主“坚决”，多有歧异。惨案责任的追究因东北民众的社会抗议，蒋介石被迫有所行动，但最终仅以陈继承去职而告终。1948年7月5日，北平东北流亡学生因反对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之《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而游行请愿，国民党北平当局处置多有不当，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学生伤亡达数十人之多，此即谓“七五”惨案，而惨案的善后与调查，更牵动华北、东北民众与舆论，东北籍学人金毓黻在其日记中直称此案为“近来一大惨案，亦流亡史中可纪之一叶”。然学潮真相、事件演变过程、责任归咎等问题，不仅今人多已忘却，即或时人亦难得其详，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目前仍旧较为欠缺，乃或基本史实亦含糊不清。时任北平市长的刘瑶章事后认为“七五事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它多方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各方面对来平的东北学生不同的态度和交织的矛盾”。本文即利用多方档案探究学潮爆发的原因及真实过程，重点展现国民党中央、北平当局与东北民众等彼

此间围绕事件的善后所展开的角力，意图通过“七五”惨案研究使得今人能够对战后学潮被政治化后所呈现的复杂面相有更深的体认。观诸“七五”惨案的发生过程及善后，初则由于东北学生反对平市参议会议案而演变为血案，迅即在东北民众的参与下事态不断扩大化，直至国民党人疾呼大有藉学潮为政潮之风险。在国共高度对立的战后中国，学潮常被视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共对于学潮爆发多有影响，但“七五”惨案作为非中共主导的反政府学潮，有其典型意义。

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

作者：严海建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77-89+159-160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也改弦易辙。而党内各派的理念分歧和权力斗争使得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一波三折。国民党试图通过改组学生团体以限制学生参与社会政治运动，但实际上囿于自身执政能力及外在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而未能如愿。执政之初的政策转变确立了国民党在此后近二十年执政时期对于青年运动之态度及基本政策，其应对青年运动的基本困境也渊源于此。可见，国民党政权从1927年南京建政到1949年在大陆败亡，其与青年学生之关系的变化是透视其执政环境及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正所谓一时代的政治决定一时代的学运，一时代的学运反映一时代的政治。对于国民党应对学运的困境，不能只看其党力的限制以及政策和观念上的问题，而应该注重政治环境和与学生切实相关的教育环境的考察。因为仅仅从政策层面及国民党本身的缺陷方面考察所得的结论，往往不能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情境中的实际情况，易陷入本质主义的误区。

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

作者：郑会欣

来源：《文史哲》2012年第1期 79-93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万众欢腾，百废待兴，国民政府忙于接收复员，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在沦陷区成立的银行及其所发行的货币。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政出多门，决策仓促，以致将伪券与法币的兑换率制定得极不合理，不仅引起沦陷区民众极大不满，就连国民党及政府内的高官亦都承认这一举措极为错误，甚至将其归结为国民党最终失去大陆的一个原因。譬如陈立夫认为，就是因为这件事“弄

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事后则回忆说，由于伪券兑换比率极不合理，所以在“一纸命令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陈诚认为，由于“事先一无准备，临时又调度失宜，再加上用人的失当，所以接收接得一塌糊涂，其甚焉者，接收变成了‘劫收’，只弄得天怒人怨，为中外所不齿”。正是由于在金融和货币问题上的处理不当以及接收复员工作中出现的种种失误乃至腐败行径，“所谓胜利也者，真如浮光掠影，转瞬即逝”，因而就在“赢得战争”的同一年中，却开始“输却和平”。国民政府在接收复员的过程中，就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制定了极不合理的方案。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多地物价因此大幅飙升，沦陷区的民众在经济上遭到了新的剥夺，民怨更加激烈。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政策的诸多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并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

社会文化史

论古典婚礼根植于人之情性

作者：顾涛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6-95+160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研究存在着不少误解，今重新梳理《仪礼·士昏礼》、《礼记·昏义》等三礼文本，推阐礼意，略作检讨。古典婚礼在本质上根植于人之情性，故在典礼的设置中蕴含了男女平等和相互尊重两条基本原则，其所设礼节处处紧扣于此，而夫妻合体和孝顺父母又是婚礼凸显的核心观念，故成妻、成妇两项仪节成为古典婚礼之重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婚姻能够长久，家庭能够和睦的人性目的。关于婚龄与婚期曾滋生千古聚讼，诸说在历史上的删汰去取，同样一以礼制将回归人之情性为尚。当今的婚俗改革，正宜抉发古典婚礼的精神内核，必须充分为人之情性张本。

朝鲜使臣眼中的清朝产业与器物——同朝鲜朝的产业与器物相比较

作者：徐东日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5-51

乾隆朝时期，朝鲜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始客观地肯

定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其北学派人士参加燕行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局面的方法。即通过对清朝产业与器物的详细考察与研究,找出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进而取长补短,导入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这个时期,他们基本认同满族文化,肯定中国重视实用的一面。由于长期以来“清朝对朝鲜采取了以恩为主、辅之以威的政策,从而对于促成朝鲜对清朝政治立场的转变、对于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宗藩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加上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具有了到中国实地考察的机会。这些因素复合到一起,就促使朝鲜朝燕行使臣得以通过燕行,对中国的车、船、髹、瓦、道路、畜牧、商贾、粪、田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与研究,从而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并通过自己所撰写的文字力求让朝鲜人承认本国文化的落后,进而取长补短,积极学习中国文化。这个时期,他们基本上认同满族文化,肯定中国重视实用的一面。所以,他们对满族社会的描述尽管“没有完全褪去其否定的色彩,但毕竟在朝鲜人的文本中,已经很少使用”比较负面的词汇,因而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以满族为主导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趋于“乌托邦”的社会。

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研究

作者:肖爱玲,周霞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65-71

中国古代都城不仅是帝国政治权力中心,还是礼法制度的策源地。唐都长安作为古代封闭都城制度的典型,城门管理制度完备而严格,唐政府不仅推行门籍制度、宵禁制度加强城门防卫,还涉及城门启闭、城门维修等制度,加强都城安全与防卫。门籍制度是唐政府为加强宫城诸门管理而推行的一种制度,要求百官及宫内服务人员凭借有效门籍进出宫殿门,在物态空间上形成一种门障,体现统治者“家天下”的管理思想。宵禁制度是街鼓管理与城门、坊门启闭相配合的一种制度,左右街使掌管六街巡逻,是宵禁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城门启闭根据鼓声而定,主要由城门郎负责,遵循开则先外后内,闭则先内后外的原则。唐长安城的城门管理制度是在前代基础上逐步完善的,城门管理制度极为严格,依据城门等级制定相应法令保证制度的实施。唐政府推行城门管理制度,对人们在城门的空间活动进行规范限制。非常时受敕启闭城门,需经城门郎、监门将军、中郎将等官员共同协作,才能对勘合符开门,体现唐代行政官僚机构的制约与合作。城门管理职官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形成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保证都城秩序顺畅运行。唐政府为加强都城防卫与稳定统治,制定出完备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唐长安城内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城门进行管理,体现权力运作与都城空间管理的密切相关性。统治者运用最高权力推行城门管理制度,通过设置管理机构、管理

者及制定一系列法令保证具体制度的实施,从而使得都城空间管理秩序得以有序运行,达到其维护统治的目的。同时唐代城门管理制度也是加强都城空间管理、获取或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唐长安城的城门管理制度完备而严格,对后代都城城门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汉代发展而来的门籍制度,被多个朝代所继承,明清北京皇宫城门的进出依然采用门籍制度来加强防卫;同时唐长安都城管理中的宵禁制度,在宋代之后,被元明清所继承,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依然推行宵禁制度;唐长安城街鼓报时与之后都城钟鼓楼的设置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对后代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代时期的“中国”观

作者:王明荪

来源:《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 47-53

“中国”词称的起源、运用及其意涵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各朝代都不乏所见,通常在统一的时代里,虽然所指有不同的对象,如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等,但都较有一致的看法,自述性的或其他者所指谓的也都少有争议;成为“中国”词称的一种传统。然而在分裂的时代,是否仍然一致或有分歧?应是值得考察的问题。此外,分裂时代的各朝(国),关于其本身的政权或国家,以及对其他各国,关于政权或国家的定位方面,应该也可由其中反映出来。自唐亡后,相继建国于华北中原之地的五代,除后汉享国仅四年,一时未见相关资料外,其余各朝在对外族如契丹、于阗,都自称为中国,是自认为正统并承袭前此“中国”意涵;而对于淮南等地分裂的各国,亦是如此。至于当时北方最有势力的敌国契丹,虽然也有以正统自居的观念,但同样以五代各朝为中国,有如汉朝与匈奴之形势,南北分据天下,各自为华夷两国,此种形势与中国观延续至契丹、北宋和南宋。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立国的五代各朝虽以正统自居于中国,但对分裂的局势仍有现实的承认,在公文书中可以看到对于对方的关系,不论称“国主”或“皇帝”,都是对其国家政权的承认,亦即天下分裂,各有其国;同样也显示分裂的各国也自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在大唐天下国家覆亡,各政权有其地而立国,理应平等而不分主从,天下非必然为一姓之天下。不过五代各朝在中原之地,其政权取自大唐的中央朝廷,以为改朝换代有其政统,也具有法统,故而以正统自居,淮南等各国就有些政权视五代各朝为正统中央,自居国主而上书皇帝者,如吴越、南汉等。然而亦有视之为对等之国而“同分茅土”者,如前、后蜀。但现实形势会因情况不同而有所改变,如唐庄宗与前蜀的关系,由平等修好至蜀国主上表后唐皇帝,而后周世宗与后蜀关系亦复如此。整体来看五代各朝的自大与自居正统是较为明显,对分裂各国只作现况的承认,因局势改变即有调整的空间,此种情形延续至宋朝的立国与统一。

赋役关系与宋明时期广西左右江区域社会的演变

作者：麦思杰

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120-127

从宋至清，是广西左右江地区逐步整合至帝国版图的历史时期。这一过程以清代改土归流的结束而宣告完成。作为中国史研究重要问题的左右江地区的改土归流，其出现的前提与基础深深地蕴涵于明以前当地社会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之中。如果从赋役流变的角度考察其如何由羁縻制度而土司制度，再由土司制度至改土归流，不同的历史事件如何引起赋役关系的变化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所带来的政治变动与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帝国、土司（洞酋）与土民三者间的关系，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又体现于赋役关系方面。赋役变化所折射出的正是地方社会逐步从洞酋（土司）管治到流官管治的历史过程，亦是王朝权力在当地构建的表现。因此，讨论该地区土民赋役状况的演变，实质上是讨论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如何由洞酋控制下的民众逐步变为王朝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而这一历史过程，又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以及地方政治息息相关。当我们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才能较为整体而历时地重新理解帝国时期左右江地区历史演变的过程。

从循道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

作者：赵克生

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42-52

纵观明代圣谕宣讲史，宣讲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是太祖六谕，看似墨守“祖制”，陈陈相因，了无新意。实际上，明代的圣谕宣讲大约以嘉靖朝为限，前后呈现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遵守洪武之制，圣谕宣讲表现为单纯的行政措施，水平不高，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很小。后一阶段多有创新，圣谕宣讲与乡约相结合，进而出现了宗族、会社的乡约化趋势。宣讲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宣讲内容的深入与系统化，“圣谕演绎”之学开始形成。圣谕宣讲这种根本性变化不仅是由于基层社会组织的嬗变，还与明代后期士人讲学风气兴盛密切相关。在许多地方，乡约会讲的组织者、圣谕六言的阐释者都是儒学士人，其身份或官或师或绅，其学术或为关学后裔，或为王学嫡传。虽然各自身份、地位、学术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怀抱学术经世的理想，眼光向下，启蒙民众，把儒学要义化为“日用常行之道”。因为太祖圣谕包含了百姓日常伦理，儒学士人便把宣讲圣谕当成实践经世理想的重要契机，纷纷致力其中，“居官居乡，常讲圣谕”。圣谕宣讲也需要国家、地方政府、宗族、会社的制度、组织保障，在圣谕宣讲的进程中，明朝的国家行政、宗族组织、士人社团等多种力量介

入其间。因为，官民、士绅都希望借助明太祖的神圣权威，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顺”、“仁爱”等伦理，成就“和谐家邦”。这种内在的动力持续推进着明代圣谕宣讲运动，将之引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同时也为清代圣谕宣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

作者：高有鹏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38-145

中国近代社会关于“神话”概念的使用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背景。我国明代就已经明确出现这个词汇，首次见于汤显祖的《虞初志》。我国近代社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陈季同和梁启超、夏曾佑、蒋观云、刘师培、章太炎、孙毓修等学者积极关注民族命运，他们的神话传说研究结合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他们主要围绕以“三皇五帝”为重要标志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述说，对在不同民族中流传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而且自觉将神话研究与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古史重建即“新史学”为重要内容的文化选择与表达。

世界史

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的言行为中心

作者：徐静波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26-133

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基于此的对华政策，奠定了整个近代日本（止于1945年8月）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基调。当然这种认识和政策并非从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也并非自始至终都呈现为单轴的状态。事实上，各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试图从各自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察以及各自的思想背景出发，对近代中国做出各自不同的阐释。就社会思潮而言，在明治中期（1885年前后）大致形成的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亚洲主义和“脱亚论”是最主要的两种主流意识。本文将着重探讨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荒尾精（1859—1896）的言行中所体现出的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政策主张。当然，亚洲主义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集合体，它本身也呈现出斑驳的色彩，但倡导以日本为盟主携手中国等东亚国家来共同振兴亚洲以抵抗欧美势力扩张大概是其

基本的主调。而每当日本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张扬国权又是它的基本归宿。在这一点上，它与“脱亚论”可谓殊途同归。

19世纪西洋势力在东方迅速展开，“脱亚论”者主要看到了文明的先进性而对其持欢迎态度，亚洲主义者主要感到了它对东方的压迫性并由此而产生了反抗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但绝大多数亚洲主义者并不否认西洋文明中的合理性）。“脱亚论”者服膺其文明的先进性而不惜摒弃自幼熟识的以中国古典为代表的东亚传统思想，而亚洲主义者则在儒家经典的浸润中萌发了东亚一体的文化连带感。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觉得经过三十年左右的维新，其整个国力和社会的发展程度都在东亚邻国之上。不同的是，前者决定脱离落后的邻国而与西洋诸国为伍，进而成为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强国，而后者试图以日本为盟主来联合或改造并掌控周边的邻国，以一个变得强大的东亚世界来与西方抗衡，以此来赢得日本对整个东亚的主导权。虽然途径不一，但旨归却是相同的。荒尾的言论中屡次使用了“唇齿相保、辅车相依”这样富有温情的词语来描述中日彼此的关联，这里我想没有任何作秀的姿态，而主要是出于内在的文化认同和地缘政治的考量。从上述我们对荒尾的言行考察中可看出，无论是他与中国相关的实际活动，还是他的《复命书》和《对清意见》、《对清辨妄》等建言书，都体现了亚洲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政治实践的复杂性。荒尾整个与中国相关的言行，体现了相当一部分亚洲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从中透现出明治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重要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今天日本人的对华认识和政策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何谓“东亚”？——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

作者：杨念群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9-53，159

“东亚”概念的形成是与西方现代历史的自身演变及其对东方的殖民化过程密切相关的“现代性事件”，这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已被提及。但要理解“东亚”认同的基础及其历史内在性，仅仅将概念本身置于西方普遍主义叙述背景下是远远不够的。从近代中日韩三国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所形成的文化心态与认同机制来看，“东亚”自身的想象不但与“西方”的崛起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关联又与“东亚”内部的政治地图与秩序安排的重组并行。因此“东亚”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交错相关的过程：一个是周边地区在形成自身的民族国家轮廓时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过程；另一个是所谓“东亚”内部的相互“殖民”

和“被殖民”的过程，甚至还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过程。近代中国在步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时，采取的是直接面对世界的方式，而没有像周边的日本和朝鲜那样必须通过“去中国化”的过程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必然造成如下后果：中国知识人在认同西方的现代化普世标准的同时，仍想以笼统的“中华性”作为统摄周边国家的认同标准。这样不仅无助于认识周边国家内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状况，同样也无助于认识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化的构成及其与汉民族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日本的“脱亚”情结可以看作是其进行现代化变革的一个必经步骤，如果不对以中国为首的“朝贡体系”等文化遗产进行清算和疏离，日本就很难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富强国家。韩国的情况可能更加特殊，它既曾经是中国的模范朝贡国，又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说，韩国要找到自己的现代位置和确认所谓“韩国性”，必须经过“去中国化”和“去日本化”的双重过程。韩国的近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韩国在摆脱了“朝贡体系”的制约后，仍能在儒学礼仪的持守方面保持着其象征的凝聚意义，这种礼仪又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奉行的伦理基础，同时韩国并没有模仿西方，在实现富强过程中把一些侵略过程进行合理化。这点和日本有很大差异，也许这才是建立“东亚”认同的心理基础之一。

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

作者：杨栋梁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10

民国初期，堪称日本“支那学”代表的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民族分裂”、“国际管理”、“放弃国防”以及由“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经济开发”等论点支撑的日本对华使命论，构成了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对中国的蔑视自不待言，整体上低估中华民族的能力和潜力、为日本等列强的殖民政策张目，是内藤“支那论”的显著特点和致命缺陷。泰斗级“汉学家”堕落为煽动对华扩张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知识分子的悲哀。一个无知的民族没有未来，而滥用“知识”的民族却会葬送现在；一个无知的学者会误人子弟，而失去良知的学者却会误国害民。内藤湖南本是造诣深厚的汉学家，但是当他堕落为战前日本侵华“国策”的“智囊”后，其学者应有的良知已为狭隘的民族私利观念所吞噬，丰富的“知识”则变成了对华扩张有理的诠释。作为战前日本的“大学者”，内藤的对华认识和主张对日本政府及民众产生的“大影响”是负面的，其深刻教训值得思考。并且，对于所有的知识“所有者”而言，内藤的教训不只属于日本，而且属于世界。

吉野作造的日本在华权益观

作者：赵晓靛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8-35

吉野作造（1878—1933）是近代日本的著名思想家，被誉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他一生发表了大量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从辛亥革命到南京政府成立，吉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整其在中国权益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生存观也束缚了他的对华认识，九一八事变后吉野对华权益观的倒退，折射出日本民众支持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战后吉野被日本人认为代表了日本知识分子的良知，则表明吉野作造的权益观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留存在于现代日本人的历史观当中。吉野作造以研究中国革命史、西洋政治史和明治政治史闻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宣传日本政治民主化，并以“威尔逊主义”代言人身份活跃于日本论坛，被誉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一生关于中日关系的论著颇丰，其中介绍中国革命和中日关系的专著4部，中国时政评论文章162篇，此外还与他人合著了一部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书。二战以后，学术界关于吉野的中日关系论的研究不断进展，相关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现象。松尾尊兑和黄自进等正面评价者认为，随着民本主义思想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变化，吉野作造最终否定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者和抵抗者；小林幸南、宫本又久等负面评价者则认为，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向天皇制妥协的产物，其对外立场反映在默认了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吉野作造对华权益观的演变为线索，重点考察吉野的中日关系论及其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在阐明其存在的抗与妥协、进步与局限的基础上，从一个侧面解析日本全面侵华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同时揭示吉野作造的权益观在当代中日关系中的思想史意义。

体育研究导航

研究报告、新论坛

运动干预对小学生身心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

作者：殷恒婵等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2期 14-27, 57

以 2463 名小学生为研究对象,确定了 5 套运动干预方案,在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实施 10 周的运动干预,结果发现,5 套运动干预方案对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揭示了不同运动方案对小学生身心健康影响的特点,为学校针对性、高效地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选择的有效运动方案。

建议:运动对于塑造小学生良好身体形态、增强身体机能、发展身体素质、增进心理健康均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学校应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在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时,应对运动频率、运动强度、每次运动持续时间、运动项目加以科学合理地监控,使单位时间内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得更加高效。

学校应根据本校场地器材情况及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特点,针对性选择不同的方案,方案实施时应对运动频率、运动强度、每次运动持续时间、运动项目加以科学的监控,并定期针对性地调整或循环运动项目,以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均衡发展。

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分层现象的质性研究

作者:熊欢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2期 28-38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女性对体育以及休闲运动的参与出现了分层现象,如何进行体育运动成为衡量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准之一。本研究以社会分层理论和体育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质性研究的范式为基础,采用深度访问的研究方法讨论了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和失业群体三个不同群体女性的体育行为及观念。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不同阶层的中国女性的体育经验是如何与她们的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家庭环境以及社会文化意识相互作用、相互牵制并导致体育参与分层现象的。通过研究认为,不同群体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和制约不同,她们并不能完全地、平等地获取城市体育发展的成果。一方面,女性参与体育的障碍已经减弱;另一方面,女性参与体育在制度上和文化意识上仍存在一定的限制因素,影响了女性体育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她们对体育参与真正意义和价值的认识。

新农村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形式实证研究

作者:王小娟等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2期 69-80

为了研究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体育服务的多元化形式,运用访问调查方法,对 6 省农村体育服务的实践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被调查农村地区体育服务实践的现状,对典型案例进

行实证分析,研究适合农村不同特点、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多种多样的体育服务形式。根据实证调查结果,进行归类分析研究,认为新农村多元化体育服务形式可以按服务主体分类、按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分类、按体育服务内容分类、按多元化体育服务形式的创新思维分类。

结论与建议: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新农村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形式在实践中已经或者能够采用的形式可以分为:按服务主体分类、按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分类、按多元化体育服务内容分类、按多元化体育服务形式的创新思维分类。建议新农村多元化体育服务形式要紧密地与农民文化娱乐活动相结合、与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相结合、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结合、与村镇企业职工体育相结合,多元融合,共同发展。

要根据我国非均衡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的区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需求程度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构适合农村不同特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新农村多元化体育服务模式,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体育服务。

在多样化的体育服务形式中,各地农村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形式。建议农村各地区依据本乡镇、本村的经济发展等具体情况,根据农民的需要,选择适合本乡镇及本村特点的体育服务形式,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

北京奥运会的历史契机,《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农村体育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等诸多有利因素,使本文研究的新农村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形式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并且,多元化体育服务形式还将会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特征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法治推进

作者:于善旭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8-23

中国全民健身运动持续而蓬勃地开展,与中国政府不断加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全民健身成为政府依法推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论文阐述了全民健身作为中国政府依法坚持的重要体育方针和战略、全民健身在与奥运同行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制轨道中快步前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得到日益推进的法治保障等发展情况,最后在概括中国政府依法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进行了展望。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要素及作用路径研究

作者:张雷,丛湖平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1期 8-22, 47

技术创新是企业产生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运用文献资料研究、访谈、问卷调查、解释结构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要素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行为,是多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包括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研发部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生产部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销售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原材料供应企业、金融机构、用户、同行业竞争者、体育赛事组织、运动员、行业协会、代加工企业、媒体、销售商和非相关企业等;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要素结构模型是一个三级的递阶结构,第二级由研发、生产和商业化三个单元构成,第三级部分要素由于功能的多重性同时作用于上一级不同要素,它们的正常运行保证了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顺利完成;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要素通过促进研发单元、生产单元和商业化单元的良好运行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创新产出绩效。

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目标科学性分析

作者:孙伏友,侯洁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1期 34-39

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科学的制定这一系统发展目标是大众体育各项工作开展的依据。以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为工具,构建系统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对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目标进行定量分析,并与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进行定性的对比分析,探讨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系统各要素之间是如何协同作用于系统发展的,从而验证系统发展目标制定是否具有科学性。研究表明,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目标是切合实际的、可行的,而体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目标是不切实际的。通过两次目标对比提示,在制定目标时,要以系统原理为依据,从定性定量相结合,从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充分考虑系统环境,防止所制定的目标带有盲目性,不切实际,造成实际操作中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

老年体质的异质性及生命历程中累积的影响

作者:张建国等

来源:《体育与科学》2012年第2期 24-28, 62

人的体质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生物学因素以及社会学因素作用的结果。生命历程中的许多事件对体质产生正或负的效应,这些效应不断累积叠加,加大了体质的异质性分化。老年期则是众多事件累积性效应的集大成阶段,同时也是成年之后体质异质性分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在人生历程中重大生活事件以及个人的能动性对体质的影响最为重要,因此加强与体质有关事件的干预以及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体质水平、保证进入老年期后有一个较高体质平台的有效措施。

发展职业体育:完善举国体制战略的抉择

作者:宋继新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1-4

举国体制是集中国家有限资源,快速发展竞技体育的一种良性的体育发展方式。但是,伴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体育也同步转向“官本民辅”的多元的“过渡体制”。在此背景下,提出发展职业体育,为完善举国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职业体育是体育市场中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元素是完整的举国体制的一部分,是对举国体制的补充和完善。发展职业体育,首先,要创立发展职业体育的新思想;第二,创造发展职业体育的人文环境;第三,要选择好发展职业体育的路径。建议:在国家竞技体育三元治理的初期,应以政府为专业队为主体,社会和市场办队为辅;中期,国家、社团、市场三者办队比例趋向均衡;后期,则以社会与市场办队为主,以政府办队为辅,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格局。

“武中道场”的历史源起评述——兼论少林武术起源

作者:周伟良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5-10

多少年来,少林武术以它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了无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皈依弟子,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然而,如何看待少林武术的历史形成,至今为止依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有关少林武术的历史源起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是南北朝说、隋唐说和元明说。前两种观点,目前尚未得到史料佐证,而后一种观点,据各种文献记载,依稀可梳理出它的基本脉络,并不晚于明中朝,少林寺内的习武活动已成规模,并以勇武而闻名于世。

争鸣与探索

区域体育发展差异与其战略选择——基于政府职能转型的视角

作者：邹师，李安娜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12

运用因子分析方法，以政府职能转型为视角，对我国的区域体育发展差异进行分析，旨在为政府制定体育公共政策提供服务，为区域体育发展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持。研究主要结论：东部着眼于梯度发展模式，发挥经济科技能力强的优势，实施领跑示范战略；西部着眼于增长极发展模式，发挥体育资源丰富的优势，实施挖潜开发战略；东北着眼于网状发展模式，发挥体育人才资源雄厚的优势，实施人才体育战略；中部着眼于反梯度的增长模式，发挥人文环境和基础设施优越的优势，实施体育崛起战略。

中西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比较——2011 体育新闻传播国际论坛述评

作者：郭晴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3-17

2011 体育新闻传播国际论坛近日在成都体育学院举行。本届论坛以“变迁、融合、创新——全球化下体育与媒介”为主题，充分讨论了中西方文化背景、媒介制度和体育制度下的体育与传媒关系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媒介体育文本、奥林匹克传播研究和受众研究等问题。基于报告人的陈述、现场问答、自由交流以及会议结束后的学术对谈，作者从中西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比较的角度对本次会议进行述评。

结语：“2011 体育新闻传播国际论坛”是国内首次体育新闻与传播学界的国际学术会议，正如本次与会者的评价一样，本次会议“内容丰富、视角多元、富有启迪”。除上述重点述评的文章外，另有谭康副教授（成都体育学院）做了题为《ESPN 失势中国体育电视媒介市场的成因探析》的报告，但敏博士（成都理工大学）做了题为《中国体育纪录片的历史、问题与反思》的报告。17 位与会的中西方学者就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与媒介、体育与新闻传播问题进行了思想碰撞，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在该研究领域的区别：从取向上看，中国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以学科建设为导向，关注宏观层面的研究及研究的系统性，而西方学者则以问题为导向，关注具体细微的问题，但却倾向于“退后一步”的研究旨趣，即其研究不是集中于球场、赛事和体育本身，而是将体育比赛、体育消费置于文化、经济、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多

元考察。不同的文化背景、传播制度、体育制度决定了中西方在该研究领域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但这并不妨碍学术间的对话和交流,相反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信息化、数字化的媒介时代,这样的对话和交流需要坚持和持续下去。

对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新思考

作者:冉学东,王岗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1期 71-76, 87

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化学、传播学、品牌学等理论,对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尽管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其更好发展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新的思考。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战略目标的真正实现,必须要强化“文化意识”、拥有“世界意识”、高扬“创新意识”、恪守“标准意识”、树立“品牌意识”,也只有如此,中国武术文化的“走出去”步伐才会更加坚实和豪迈,样式才会更加多元和丰富。

从《论语》看孔子的体育思想观念

作者:王京龙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1期 77-80

就《论语》而言,孔子的体育思想观念突出表现为四点:一是提出了“成人”教育的体育主张;二是形成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观念;三是提了了劳逸结合的运动理念;四是提出了“仁者寿”和“食不厌精”的保健观点。这些思想观念所张扬出来的基本精神,便是以人为本,以仁为纲,以礼为准。由于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使得他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位置。今天看来,这些体育思想观念仍然有着突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为中华民族的现代体育发展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营养。

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刘媛媛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1期 81-87

从先秦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基本理论入手,探索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

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先秦时期,在不同的思想背景和治学传统下,形成了儒家社会化身体观、道家自然化身体观、医家实体化身体观;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各有千秋,共同筑造了中国古代先秦身体观的理论大厦,这三者分别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施加了社会化、自然化、和实体化的影响;诞生在这一片身体观土壤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社会伦理层面、万物自然层面及人体自身生命结构层面对当代体育文化有所补足。

结语:“人类的普遍关怀是自身生存状态”,这种关怀历久弥新、亘古不变,而体育是人类重要的身体实践活动之一,对体育文化进行研究是这一关怀的生动体现。

大而观之,对体育文化的研究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视,小而视之,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对体育自身的进步发展也颇具意义。历来学人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做过很多探索,较之以往学术成果,作者选择在先秦身体观语境下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从先秦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入手,审视不同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

从现实关怀和时代意识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儒家从社会道德层面入手所形成的身体观,还是道家追求自然大道所形成的身体观,甚或医家切实关注身体自身所形成的身体观,古人这些明确针对人的身体而发生的意识与认识是影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元素,诞生在这一片身体观土壤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当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和可借鉴的价值。

古希腊与中世纪体育的兴衰探源:基于对身体和娱乐的考察

作者:赵国炳,杨忠伟

来源:《体育科学》2012年第1期 88-95

身体与娱乐是体育的重要属性。文化系统的身体观和娱乐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在该文化系统的命运。古希腊文化崇尚自然,强调身心和谐,推崇感性的身体和娱乐;中世纪唯美主义的基督教文化贬低身体和娱乐,从而前者之体育兴盛,后者之体育则衰落。体育的人文价值在于它是灵魂与理性僵化统治的反抗者,旨在实现人的身心和谐与自由。

城市不同家庭类型体育锻炼特征分析——基于“7种家庭类型”的实证研究

作者:沈建文

来源:《体育与科学》2012年第2期 70-7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日趋小型化、类型更加

多样化。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逻辑分析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泛长三角”区域5座城市7种家庭类型,在体育锻炼频次、时间、人际环境、空间环境以及体育项目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体育锻炼特征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究,分析了不同家庭类型选择体育项目的主、客观因素。结果表明:不同家庭类型体育锻炼特征,差异性大于相同性。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

英国休闲体育政策的演进特点与启示

作者:胡军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40-43

以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对英国休闲体育政策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英国的休闲体育政策的演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少数阶层享有向大众参与转化的政策导向;以宏观间接调节为主要管理模式;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并提出了英国休闲体育政策对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的启示;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化机制;努力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作用。

结语:体育休闲娱乐是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一部分,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增长,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休闲体育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借鉴发达国家体育休闲政策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我国休闲体育发展,更好的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体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均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的层次与评估指标研究

作者:张业安,肖焕禹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48-51

基于媒介传播效果理论,对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心智模式视角分析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形成的心理机制;将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分为浅层、中层、次深层及深层传播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由媒介传播、受众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负面效果等组成的大型赛事媒介传播效果评估指标。

结语: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各方利益的诉求,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在大型赛事的各个阶段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媒介是体育赛事的申办和筹备不可或缺的资源积累者和舆论影响者;媒介是体育赛事的运行和管理至关重要的营销传播者和平台搭建者;媒介是体育赛

事不可替代的形象塑造者和体育赛事最终效果的重要裁决者。媒介对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效果不仅是衡量[中举办得是否成功]的标准,也关系到媒介、赞助商、受众和政府等多方利益群体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目标实现程度。因此,厘清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的层次和具体评估指标,是实证评估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实际效果的理论基础,也是在实践中优化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的必要手段,对转型期提升我国体育传播社会效益、推运社会文明进步意义非凡。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品牌定位研究

作者:刘岗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2年第1期48-53

品牌定位是品牌营销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的品牌发展中,品牌定位尚显模糊,致使其在品牌建设中策略偏差,着力点不准,从而影响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的品牌发展。依据国内、外品牌定位的一般流程并结合我国篮球联赛的自身特点,总结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的品牌定位:为喜爱篮球运动的、收入中低水平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群体(21-41岁)提供长期稳定的现场赛事体验。针对这一定位,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的品牌营销中,建议可从如下两方面入手:1)加大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吸引力度;2)完善CBA联赛现场体验的各环节。使CBA联赛的品牌定位不断强化,并在众多体育赛事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消费者观看现场比赛的首要选择。

“以钱养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新思路

作者:秦小平等

来源:《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32-35

“以钱养事”机制的内涵包括市场订单、农民签单、部门审单及政府埋单。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市场理论、政府采购理论及公共物品理论。认为:“以钱养事”机制可以促进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降低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激发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人员的积极性。提出:应因时、因地、科学地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项目进行立项;实现精细化管理;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实行绩效管理。

“城中村”居民体育休闲娱乐研究

作者：朱家新，常德胜

来源：《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6-42

采用个案研究法，将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相结合，对“城中村”居民的体育休闲娱乐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城中村”居民的体育休闲娱乐方式随社会变迁而改变，近20年来居民体育休闲娱乐快速发展，并成为居民闲暇生活的主要内容。节庆仪式性体育走过辉煌历史后出现下滑和分化现象，现代体育在“城中村”逐步呈现发展趋势。体育休闲娱乐在“城中村”不同社会群体间起到和谐、调适作用。

结论与建议：1) 结论：体育休闲娱乐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演变；体育休闲娱乐具有一定的阶层性；传统与现代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体育休闲娱乐是“城中村”社会的润滑剂。2) 建议：处理好民俗体育的现代价值转化；充分利用体育休闲娱乐对社会矛盾的调适作用；体育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应与经济发展同步。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 挠羊赛为视角

作者：孟林盛，李建英

来源：《体育与科学》2012年第2期 75-79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尴尬的困境。幸运的是，国家已经加大对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在这个进程中，民间体育文化的发展已经唤醒了人们对其的热爱和追寻。本文以“山西挠羊赛”为视角，通过追溯其发展历史及目前的保护现状，然后分析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保护上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积极探寻解决其法律保护不足的对策建议。本文旨在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性，希望对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主作用。

全国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现状统计分析

作者：席玉宝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59-163, 177

通过对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中学校体育场地进行统计与分析，指出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场地总体开发程度。从不同类型学校看，“其他学校”开放程度最高，依次是高等

院校、中小学、中专中技学校。从区域上看,全天开放程度最高的是西部地区,部分开放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不开放程度最高的是中部地区。从不同项目场地看,开放状况程度最高的体育场地主要是一些时尚类、非教学类的运动项目的场地;普及程度高的篮球和乒乓球场地是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主体。

五禽戏锻炼对老年人抗氧化能力和肠道乳酸菌的影响及相关性研究

作者:段丽梅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2年第2期 112-116

为探讨五禽戏对老年人机体抗氧化活性影响的规律及其生理学机制,对长期练习五禽戏的老年人进行抗氧化能力和肠道乳酸菌的测试。结果表明,与五禽戏练习前相比,练习2个月、4个月时,血清MDA水平明显下降,GSH水平、SOD、CAT、GSH-PX和GR活性以及肠道乳酸菌数量明显上升,且均没有显著性别差异,提示五禽戏练习可以明显提高老年人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和肠道乳酸菌的数量,促进机体健康。乳酸菌通过产生SOD、GSH和还原性物质等,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可能是五禽戏练习使老年人抗氧化能力增强的生理学机制之一。

大学生身体活动阶段变化与健康状况关系的研究

作者:段艳平等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2年第2期 117-121, 131

基于锻炼心理学领域中的“从无活动到保持活动的4步骤模型”,以3807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大学生身体活动阶段变化与健康状况变量(身体体质、主观良好感、健康满意度和不适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处于活动阶段的个体,其健康状况水平均好于处于不活动阶段的个体;在3个活动阶段上,处于保持期(即长期保持规律性身体活动)的个体,其健康状况水平均好于处于探索期和波动期的个体;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健康状况变量共同解释了17.6%的阶段方差变异。验证了FIT模型中大学生身体活动阶段变化与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今后运用FIT模型诊断大学生身体活动变化阶段及其相应健康状况提供了实证依据。

榜样对大学生运动员自我损耗的补偿作用

作者：董蕊，张力为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2年第2期 122-131

检验名人榜样和身边榜样对大学生运动员自我损耗补偿作用。60名男性足球专项大学生运动员参与实验一，观看视频控制注意诱发自我损耗，阅读榜样文本产生启动效应，最后完成迷宫任务。40名男性篮球专项大学生运动员参与实验二，观看视频控制注意诱发自我损耗，填写《自我控制检查表》促使研究参与者回忆身边榜样的自控能力产生启动效应，最后完成 Stroop 任务。实验一发现，运动领域榜样文本和非运动领域榜样文本启动下，损耗组与非损耗组的坚持时间不存在差异；中性文本下，损耗组的坚持时间显著短于非损耗组；实验二发现，损耗条件下，回忆身边自我控制好者的研究参与者比回忆身边外向性格者的研究参与者在 Stroop 任务上的不匹配正确数表现更好。来自运动领域和非运动领域的名人榜样都对自我损耗起到补偿作用，且补偿效果不随榜样的社会类属及损耗状态改变；身边榜样可以补偿大学生运动员的自我损耗效应。

运动竞赛与训练学

竞技体育视野下的女性性别认同建构

作者：丁洪江，张红学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2年第1期 27-31

伴随着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高涨，女性在竞技体育中的性别认同建构引起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以福柯、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女性性别认同建构予以关照，深刻影响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男性话语建构下的竞技体育发展视角下，论述竞技体育中女性性别认同建构。主要分析体育运动中女性身体的展现和竞技体育中女性身体建构两个方面，并以个案研究为例论述竞技体育中女性性别认同建构研究。

竞技体育是男性话语下的产物，女性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要求建构身体，走过了极为漫长的道路。在竞技体育中，女性性别认同建构始终依照男性话语，深受男性主义下父权社会根源的影响。男性话语建构下的竞技体育，女性始终无法超越男性放进行自我性别认同，并始终处于男性话语下权力规训。女性身份的确定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影响我国竞技体育潜优势项目发展的因素分析

作者：王卫国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68-70

运用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等方法，以影响我国竞技体育潜优势项目发展因素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国内外竞技体育的发展现状，从理论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提出影响我国竞技体育潜优势项目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源因素、运动训练因素、科研经费投入因素和管理制度因素。

美国棒球与板球发展消长之谜

作者：张世强，张世泽

来源：《体育与科学》2012年第2期 95-101, 117

多年以来，运动史学家都在争论，何以棒球能在曾为大英帝国殖民属地的美国取得凌驾于板球的发展。板球在美国的迅速式微，无论对于棒球或板球研究来说，都堪称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及至今日，棒球与板球关系背后仍然存在许多难解的问题。既有文献指出，板球在美的发展不仅可以上溯至17世纪，直到1860年代，板球也仍为美国非常普及的运动；但吊诡的是，就在内战之后，当美国社会进入“镀金时代”之后，板球却逐渐式微，甚至沦为美国边缘运动。透过检视美国棒球与板球发展的历史，本文企图指出主流理论的问题，尝试针对美国棒球与板球发展消长的关系提供不同的解释。

世界女排强队比赛得分结构与球队成绩排名的相关性分析

作者：春潮，唐永泉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40-243

排球比赛中球队得分结构对其成绩排名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综合运用资料调研、数据统计、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世界女排强队比赛（以2009年、2012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决赛为例）得分结构与球队成绩排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计算皮尔森相关系数表明：球队比赛排名与球队拦网得分、拦网平均每局效率显著相关且正相关，与扣球平均每局成功率相关性较大，与发球及发球平均每局得分相关性并不显著。对于此规律的认识对排球训练有重要参考意义。

构建跳绳大众锻炼等级评价标准的研究

作者：张艳霞等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35-140

为了选择适合大众锻炼的跳绳评价指标，规范跳绳技术内容，建立跳绳大众锻炼等级标准。采用资料分析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教育测试法、录像分析法进行研究，得出结论：1) 确定跳绳大众锻炼等级评价标准的测评内容为 1min 单人绳跳及 3min10 人长绳“8”字跳、基本动作类指标和难度动作类指标。2) 确定跳绳大众锻炼标准等级评价体系，主要分为三段九级，建立逐级递进的等级评价标准模式：达标部分通过离差法确定各个等级的评价标准，技评部分通过完成基本动作和难度动作数量来确定各个等级评价标准。3) 对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以及男女之间差异进行了分析，最终确定各个测评内容 1-9 级的分级标准。

体育教育、管理学

从“运动制胜”到“运动致趣”向俗回转的思考

作者：李杰凯

来源：《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8-82

在现行运动技术学科的教材研究中，运动项目教材的建构以“运动制胜”为出发点，很少涉及运动兴趣培养和运动快乐获得问题，其原因是受早年竞技体育教学观和机械还原方法论的影响。基于运动项目教学理念的思考，对“运动制胜”与“运动致趣”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在当前教学目标多元化的现实社会，除专业运动队外，均应在大体育观下以“运动致趣”作为体育教学的终极目标，“转俗成真”的运动项目教材研究要“向俗回转”，建构适应多元教学目标需要和学以致用用的教学内容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高中体育教材内容的演变脉络与展望

作者：李启迪等

来源：《体育与科学》2012年第2期 112-117

通过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对建国以来八次体育课改中高中体育教材的内容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1) 高中体育教材选编原则、教材内容的变化符合各个时期

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并逐渐体现了教学以“健康第一”、“学生为本”的理念与思想；2) 历届课改高中体育基础知识教学内容与教学时数比重基本保持一致，并列为必修教材内容；田径教材内容教学学时数与比重变化较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体操教材内容的教学学时数从总体上也呈现下降趋势，第八次课改许多省市则取消了体操教材内容。球类教材学时数与比重起伏不定，教材的性质从必修到选修中的限选内容；游泳教材内容主要体现了地域性特点；武术或民族传统体育教材内容是我国特有的体育传统项目，基本列为必修教材。根据以上分析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我国体育课程实施研究评析

作者：胡庆山等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77-82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体育课程实施的已有研究给予了评析。研究认为：我国体育课程实施研究的历程短暂，成果数量有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研究中具有研究者偏少、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欠缺、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受体育课程自身理论发展所限等问题。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体育课程实施研究中要树立学人意识与学问意识，注重对体育课程实施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拓展研究视角和方法，并将其纳入体育课种论研究进行系统规划等建议。

高校中年教师体育健身意识现状研究——以大连市高校为例

作者：商伟，胡海波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97-102

从高校中年教师体育健身的行为意识入手，结合大连市高校中年教师健身意识的实际状况，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理论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对其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意识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1) 高校教师步入中年后，对自身保健意识淡薄，进而导致大多数中年教师的身体机能状况下降；2) 中年教师由于角色转换，导致业余时间缩短；3) 对抗性强和运动量大的体育项目不再受到青睐，相反户外及小球运动的开展相对较好；4) 高校教师对于体育锻炼的资金投入不足，并且对于体育消费的看法呈消极态度；5) 高校体育健身设施存在着数量少、质量差、结构不合理、配套设施简陋、只能基本维持教学的普遍现象，从而限制高校教师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高校老师体育锻炼与工作倦怠研究

作者：周毅刚等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03-106

选用《马氏工作倦怠通用量表》、《身体锻炼等级量表》对 515 名高校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高校教师体育锻炼情况不容乐观；从理论值来说高校教师工作倦怠的程度并不严重，但情绪衰竭因子得分偏高，具有内隐性的特点；体育锻炼的强度、时间、次数、锻炼量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身体锻炼量、锻炼强度 进入工作倦怠总分的回归方程。

民族传统体育学

加与减：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另类思考

作者：李翠霞，赵岷

来源：《中国体育科技》2012年第1期 96-101

纵观中国武术发展之路，我们在武术上做加法太多，做减法太少。加的结果是使武术日渐积重难返，为枝节所困扰，左右为难，进退失矩。当前，世界全球化发展使得同质化进程日渐加快且不可逆转。只有解除对武术的束缚，剔除它身上历史的重负才能使其重获新生。这种减法并不是直接的切割抛弃，而应该是有选择的提炼，还原武术的精华，凝聚武术的元典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中国武术最辉煌灿烂的一面。

西汉初期健康导引术式名称中哲学问题的探讨

作者：刘朴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92-196

1973-1984 年，湖南省和湖北省出土了 2000 年前的竹简《引书》《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和帛画《导引图》。对一些文物中的健康导引术的分灰及命名思想的先行研究大多还不够深入。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于这些导引式名称进行了分类对比研究。探明了西汉初期对导引式命名的哲学问题，找出了其特征及内在关系，同时也明确了汉代人创编健康导引术的指导思想。

竞技武术“文化空间”之研究

作者：吉灿忠

来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97-200, 218

竞技武术赛场兴起于20世纪初，自一开始就产生了强大文化驱动力。运用文化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分析了当代竞技武术“文化空间”所扮演的文化角色，研究发现，竞技武术“文化空间”出现了文化话语权政治化，行政管理中心化，受众群体边缘化和传统文化流失化等现象。但同时必须承认其在当代中国武术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影响力，且应通过树立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积极到民间去“采风”和“寻根”，坚持走竞技武术“文化空间”的“城市化”与“乡村化”并驾齐驱的发展道路。

《信息导航》2012年第1期 总第24期

主编：冯琴

编委: 夏文华 田卫方 程萃文 杨艳燕

主管: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主办: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地址: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业务楼一层

邮编: 041004

电话: (0357) 2055679

E-mail: tsgckzx@163.com

出版时间: 2012年2月